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來將的義主本資

著 德 伯 仲
譯 任 樑 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 會 科 學 小 叢 書

何 炳 松 劉 秉 麟 主 編

資 本 主 義 的 將 來

附 譯 者 著「仲 伯 德 在 經 濟 學 上 之 地 位 及 其 學 說 體 系」

Werner Sombart 著
張 樑 任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552
182

仲伯德在經濟學上之地位及其學說體系（代序）

張樑任

在經濟上同時在政治上最爭執的問題，莫過於資本主義的將來。資本主義將崩潰抑將繼續存在，這是我們值得注意而必須探究的問題。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經濟著作，大半與此問題有關；換句話說，沒有這個問題的爭執，經濟書庫，必無今日之豐富。而在政治上，也因為這問題之難以解決而有黨爭之激烈化，致引起社會的紛擾。

爲什麼這一個問題——一個很被注意的而人們又化去了無數腦汁考慮了的問題，還爲人們爭執的觀象呢？這固然有許多原因，可是爭執者之不全由公平的，學理的立場出發，而多少被政見或成見所支配，亦是其中原因之一。而經濟學者中，亦竟有不盡秉公運用研究方法或歷史事實，平心靜氣地洞燭資本主義之所以發展及其勢力之消長。負有盛譽的維納仲伯德氏（Werner Sombart），鑒學術界之紊亂，時代之要求，毅然以研究資本主義之前因後果爲己

任。他費了十餘年之功力，著成近代資本主義一書（*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迄於今日凡是經濟學的學徒，置爲案頭必要的文獻。此仲氏巨著，訂爲六大冊，前二冊名爲前資本主義經濟（*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中二冊名爲初期資本主義（*Der Frühkapitalismus*），後二冊爲盛期資本主義（*Der Hochkapitalismus*），舉凡關於資本主義的一切問題，應有盡有地討論着。於此範圍中之書籍，仲氏之巨著，不愧首屈一指了。

這書雖係名著，然而讀此者不易普偏，一因讀者忙於事務，時間所限，無暇讀竟六大冊；二因書價昂貴，非人人所能購置。仲氏有鑒於此，久欲將其思想大概繕成小冊，供給有上述困難的好學之士。一九三二年，仲伯德却好受德國有名的「幣制信用經濟研究會」（*Studiengesellschaft für Geld- und Kreditwirtschaft*）之邀請，演講資本主義之將來，歸後再加整理，刊成小冊。一時購讀者踴躍異常，一月中易數版，開學術界中罕有的先例，蓋此書雖係小冊，然可代表仲氏學說之體系的概觀，可以當作仲氏巨著的縮影。

譯者受教育於柏林大學，聆仲氏之講學凡七年，且親聞仲氏之資本主義之將來的演講，覺

其內容謹飭，意見有獨到之處，故譯之以供國人。惟仲氏小冊，究係由講演稿整理而成，因講演時問之有限制，僅能將其整個思想之重要者，以最少最簡括的文字敘述，字字含有重大意義，含有無數思想因子，小小的冊子，簡直總括仲氏所代表的整個意見（註一）。故對於從未讀過仲氏著作的人或尙未了解其整個思想的讀者，於讀此一資本主義的將來一時，不無困難。因此於讀者未讀這小冊子以前，讓譯者將仲氏在經濟學上所處之地位及其思想之大概，介紹於後。

A. 仲伯德在經濟學上之地位

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仲伯德的經濟學說屬於那一派呢？曰屬歷史派。所謂歷史派者，係反對自然學說而起，該派的基本思想，在反對經濟法則的絕對性和無時間性，主張經濟組織之相對性。換言之，經濟全恃人類發展程度而定的，論理和政治是經濟思想的基礎。

歷史派前接正統派，後聯界限效用派，居這二者之間，對經濟學有重大的貢獻。就研究方法言，正統派主演繹，歷史派主歸納，界限效用學說又主演繹，一反一覆，如物極之必反。

歷史派勃興於德國，反對正統派的學說，那是有當時的背景的，正如正統派以前之重農學說，反對重商學說相同。重商政策盛行於十七八世紀間。當時因經濟組織之顛覆，希臘哲學家代表之倫理的，輕忽財富的觀念漸被淘汰，而有謀財富為目的之思想代興。因此研究致富之道的人們，一天多似一天，即國家亦以人民達到富庶為任務。這樣，經濟就踏入政治範圍內了，不再如中古時代經濟僅僅於倫理或道德範圍內被人注意。這樣看來，中古時的經濟，是一倫理問題，十六世紀以後，變為一政治問題，現在經濟學中的經濟政策即基源於此。

這個趨勢，有牠的背景。當時國家主義思想勃興，政治上非謀統一不可，沒有中央集權，不能安內而攘外。可是祇靠國家統一尚不夠，還要經濟獨立，故須求一經濟上統一的國家。於是有交通的發展，生產的保護，實業的獎勵了。而國家要增加稅收使中央集權得以維持的思想，對這經濟力之發展與促進，不是沒有影響的（註二）。

所以重商主義不再注意道德的原子，而企求國家權力的鞏固。欲求實現，必須有富豐之稅收及人民之富庶。所以一國經濟力的發展，如工商業之促進，是亟不容緩的事實。重商主義以金

錢來代表財富以爲黃金越多，國家即愈富。等到國家所有的錢財羅掘無餘，然後進一步向外貿易，換取錢財，所以有利的商業決算，即輸出超過輸入，這無怪成爲當時的一般企求。以上一切，實是在基於企求國家權力之鞏固，經濟之富裕，而演繹出來的政策罷了。重商主義認經濟爲國家的生活表現，經濟與國家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這點已在當時被人認識，是比較以前進步的地方，然而經濟尙附庸於政治，那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吾們看到基督教被道德及倫理觀念所支配而制定公道價格及禁止利息，那末無怪促進富財的人民，爲逐利而去探討價格造成的原子和貨幣的本質了。重商主義後期的經濟學者，對價值、價格、貨幣、利息、對外貿易及生產，曾作深切的研究，於是經濟狀況的碎瑣智識，漸漸成爲一真實的科學了。理論經濟學，就發軔於此。

可是重商主義探究經濟生活的變化，離科學的探討尙遠啊！要發展經濟學成一獨立的科學，非找到一個統一的觀點不可，然後將各種經濟問題依此而分類。重農派的始祖克內（Quesnay）（註三）居然做到這點，他所看到的觀點是滿足慾望的根本事實，在這個觀點下，經濟

問題成一好像有機體的系統了。

除此以外，克內尙有其他的功績：他認識經濟生活被牠內部發生的法則所支配。克內以爲自然和社會，均是神造秩序所發出來的，而這神造的秩序，却早已有牠的法則。這樣，克內對這新科學，有了一定的目的：探究國民經濟學的法則。

克內及其信徒以原來的，基因於事物本質內的聯繫爲「自然秩序」，亦即國民經濟之健康狀態，他們以人力干涉爲反自然秩序。這派因企求及贊助經濟的自然基礎，尤其偏護農務，所以命名爲重農主義（Physiokratismus）（註四）。

重農派不能滿足於討論單個經濟問題，也沒有興趣在政治問題中討論經濟問題。他們所渴望的是對經濟生活造成一個有系統的統一的組織，造成一種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並。該派得哲學的，尤其是自然權利（*Naturrecht*）的激獎，便努力研究經濟生活。正與研究這個自然生得之權利一樣，經濟生活的自然聯繫及自然狀況，爲這個新科學的對象。所以這個科學，起初就是哲學的科學，視爲社會哲學的一部份。這個科學可以說是介於自然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爲這

二者的連節。

重農主義學派欲以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連結，故以滿足慾望及取得滿足慾望之物件爲自然事實。因之他們特別注重這產生滿足慾望之物件的農業，及主張國家竭力免去干涉的經濟生活，讓牠無拘束地自流着。

經濟學派的第一派，雖由克內成立，然而被後世推尊爲經濟學之父的，却不是他而是創造正統派的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這是因爲亞當斯密能够在哲學的基礎上，給我們一個廣闊的，從統一的觀點上計劃的系統，這個系統，較重農學派抽象的學說，較爲實際。

他和他的信徒同意於經濟生活的自然學說，亞當斯密對經濟學之基礎與重農主義派同樣，由經濟生活發出來的法則應當研討，經濟生活的機械體，應當認識。正統派和重農學派不同者，是前者改變後者之對財富來源的片面觀察。我們不要忘記正統派發源於資本主義英國，那重農派僅對農業片面的贊美，與英國的事實相矛盾。烟霧迷茫的工廠烟筒給予了英國財富，這不是農業所可辦到的。因此人力及資本的意義，於英國特別被人注意，較發生於法國的重農

派被人重視得多了。觀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註五）第一句謂財富的基礎係勞工，就可知道他注意勞工的一斑了。除外，亞氏屬蘇格蘭道德哲學派，故不能同意於重農派的任意放棄倫理的原子。

亞當斯密經濟學的廣大基礎，却不能長久被人保持着。以演繹法研究著名之李嘉圖（*J. B. Vid Ricardo 1772-1823*）就大大地縮小了亞氏的範圍（註六）。他屏去一切關於道德哲學的原子，而把國民經濟學作為經濟生活的純粹自然學說。人們的來往，交換經濟及與之有關的，由自私盈利的原則所發出的現象，僅僅這些李氏以為是國民經濟的內容。這是李氏及其信徒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就優點方面說，李氏將這個新科學予以統一化；就缺點方面說，李氏不能解釋複雜的經濟生活，像這樣科學未免太抽象，與牠所要解釋的真實生活，相距太遠了。

重農派所討論的材料，再由正宗派擴大或增加，不久即成一科學的系統了。牠由價值與價格學說，貨幣學及分配學，生產學與消費學而成的。然而科學不僅是混沌的認識，却是有條理的知識。所以在這方面所得的功績，誰都不應抹煞。不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沒有將國民經濟學成

一完全的系統，這個成就，不得不有待於賽氏（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註七）及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註八）二者了。

根據上面所說的，我們知道，亞當斯密，李嘉圖及其後起者們，倘以正統派名字來包括，似太含混。不過這派的人，有他們共同之點。尤其是個人主義的特色，這是由重農主義的自然科學之思想方法而來的，因這個個人主義的特色，使人們以經濟當作個人的現象。經濟的社會方面，他們當作個人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受資本主義訓練的英國人，以求利代替這重農派所認識的慾望滿足，正統派以求利為經濟生活之原動力，牠施其作用於供求相遇之市場上。自由競爭視作管理的原則，牠固然並不被否認為社會的現象，却視作個人求利的效用。同樣是分工。在其他方面，亞當斯密及其直接的信徒，如馬爾薩斯（註九），賽氏，雅各伯（Jacob）等一流人物，和李嘉圖及其信徒，尤其是穆勒雅各（James Mill）（註十）及麥可洛（MacCulloch）之間，有不少的異點。前一支帶倫理及歷史色彩，而李嘉圖及其信徒嚴格地繼續建築國民經濟學的自然學說。我們須記著，離事實太遠的李嘉圖的抽象學說，不久亦受限制。賽堯（Senior）（註十一），凱爾納思

(Cairnes) (註十二) 及穆勒約翰不同意學說的太抽象化，而後者因顧到各方面的現象已頗接近亞當斯密的立場了。正統派的代表者只有在政治要求中，在企求經濟自由中，彼此表示一致。

這個由重農主義創立而由正統派發展下去的學說，把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獨立了。這個成功，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經濟生活不是單獨地被觀察的，却是附屬在人類和社會的單位內，假使我們要單獨觀察這個經濟生活，那末非引用經濟行為的單獨方法 (Isoliertmethode) (Höffe) 不可。因此正統派有「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 的構成。

可是「經濟人」僅是虛空的形狀，非實際可捉摸的。「經濟人」要表示人類一切行為，只被逐利所支配。倘使正統派始終明白「經濟人」僅是理論的構造，那並沒有什麼弊病。但是正統派的學徒常常忘却這點，而由「經濟人」所得的推斷，無條件地直接應用於實際生活，好像人們真是僅僅追逐盈利而已。

即正統派中之穆勒約翰，對該派的經濟法則之無時間性，亦生懷疑他以為在生產方面固然有永久法則，可是在分配方面是沒有的，因為經濟生活常被社會變化所影響。

在以前，人們於論理及政治範圍內去觀察經濟，到了正統派，經濟生活，因學理化之故，全由這些範圍內解放了出來，且由人類及社會連關上抽拔出來。無怪這種觀察的結果不合於事實的真相了。

因此生出反對這經濟生活的自然學說之各派了。第一派是倫理學派，(ethische Schule) 由西斯蒙提 (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 (註十二) 所成立。西氏在一八一九年出版的著作，責備李嘉圖，謂在「經濟人」基礎上建築的經濟學，不過是一種商人經濟學，而忽略了人類社會的道德。西氏的論理派乃為後日社會政策的出發點。

反響正宗派自然學說之第二派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派與正宗派的相異點，不在理論方面；而如這派的陸排拖斯 (Rodbertus) (註十四)、馬克思 (Heinrich Karl Marx 1818-1883) | 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註十五) 却都站在正宗派的學說上，尤其李嘉圖的學說上，而以李氏的學說為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寫真。不過一到他們手裏，「經濟人」和論理要求的衝突，作為反對現在社會秩序的理由了。馬克思以為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帶着社會主義的

種子，牠越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的實現期越近，牠發展到極度，也就是牠的崩潰，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抬頭。資本主義經企業集中（集中學說 *Konzentrationstheorie*），固定資本增加，工人失業（工業常備軍），羣衆之無產化（厄連學說 *Verelendungstheorie*），危機式的擾亂到資本主義的崩潰而達社會主義的勝利。

不特因正統派的道德觀點和個人主義引起反響，正統派將經濟與社會其他的生活表現分開以及主張世界主義的二點，引起羅蒙派領袖米勒（*Adam Müller 1779-1829*）及國家主義的李士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所反對。米勒係德人，受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的感化，而正是這個哲學與正統派頗不相容。米勒的著作（註十六）係羅蒙哲學的產物，反對正宗派以自然權利的觀察法，去觀察經濟生活，他却以經濟生活為社會生活整個之一部；而李士特（註十七）則以為正宗派談世界主義，不切合一國狀況。在某種觀點看來，米勒尤其是李士特帶了歷史派的色彩，所以大半的經濟思想史中，常把他們當作歷史派的先鋒。

這反對正宗派自然學說的歷史派，不僅將倫理觀念重新導入國民經濟中，同時還反對正

統派的不注意歷史事實。所以歷史派的成立，由於不滿意正宗派的不顧慮道德，國家及歷史事實等諸原子。歷史派除顧慮到以上的原子外，還反對經濟法則的絕對性和無時間性，而主張經濟組織之相對性。倫理和政治，歷史派又拿來當作國民經濟學的基礎了。

陸隙 (Wilhelm Roscher 1817-1897) (註十八) 係歷史派舊支的創造者，他並不要擯棄正宗派學說，祇願以歷史材料去補充牠。他並不否認經濟學法則，但是相信要明白現在必先了解過去。到了希爾勃郎 (Bruno Hildebrand 1812-1871) (註十九) 與克尼斯 (Karl Knies 1821-1898) (註二十) 這派反對經濟法則之無時間性，而以探究經濟的發展法則為己任。至於歷史派的新支，則由許模勒 (Gustav Schmoller) (註二十一) 所創造，他說歷史派新系與舊系的不同，在於新系不願馬上就一般化，而感覺有根據材料和事實之搜集，作特別研究單個時期，單個經濟狀況之必要 (註二十二)。然而這兩系的根本思想，還是相同。

探討的精神，並不停頓着。正宗派因理論的努力而太抽象了，所以又生出反響的各派。歷史派對於經濟政策，有許多貢獻，因為他們將社會其他的原子，如民族的意識，倫理的顧慮，政治的

基礎等，都歸入國民經濟學內。可是牠僅有歷史上的敘述或倫理上的探索，不能滿足一度引起了的經濟法則的探究之興趣。

在英法，奧都感着這個需要。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註二十三) 瓦

爾拉 (Marie Esprit Leon Walras 1854-1910) (註二十四) 及孟格 (Karl Menger 1840-1921) (註二十五) 審察正宗派的出發點，一方面在與「缺乏」概念有關的經濟量的原子上；他

方面在個人主觀的經濟決斷上建築了一個新的理論系統。包括這二個原子的概念，界限效用，牠作爲這二個再以理論探究的學派之基礎。第一派是數學派，也名洛桑派 (註二十六)，以爲經濟的根本法則，在於經濟均衡，而以——因爲是量的問題——數學工具去探討。界限效用學說的第二派偏向心理原子方面，係由維也納學者所創造，故名之爲奧國派或維也納派 (註二十七)。

這新的界限效用派，好像把正宗派學說完全擯棄，我們如果加以深密考慮後，即知不然。馬夏爾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合這二派的學說，把耶方斯和正宗派的結果，吞納於他的系統中。他的學說又發展爲劍橋派，這派很趨向於數學方法。

與正宗派國民經濟學一樣，界限效用派也探究國民經濟的聯繫，敘明價值和交換現象。牠要達到這個目的，也用單獨方法，也建築於「經濟人」的抽象上。這樣界限效用學說，也成了純粹經濟學，與克內及李嘉圖代表之系統相同，不過更有意識些罷了。正統派之其他的前提，如市場的統一性，貨幣量與價格的聯繫等，於界限效用說內更深刻地敘述，因為牠也探究一個理想市場，拿這個理想市場來指示真實市場的趨勢。該派與正統派的異點，最重要的是在價值學說範圍內，將價值的主觀性質特別指出，因此頗有影響於奧國派的價格學說和分配學說。但是市場，價格造成及分配問題始終為界限效用學說（註二十八）的主要問題，正與正統派一樣。

當界限效用說剛起始的時候，德國歷史派正蓬勃猛漲，向孟格進攻（耶方斯和瓦爾拉尙未被週知。）許模勒反駁孟格的學說，因此發生方法爭執，孟格在他的著作內將社會學的方法詳細討論，證明歷史和倫理的探討不能代替單獨的方法。許模勒及其信徒堅決地反對後者，而孟格及瓦爾拉從未否認過歷史和倫理的觀察法之價值，却認牠為經濟政策的出發點（註二十九）。

經濟學並不因此而息止爭執。米勒和西斯蒙提所懷疑之由單獨方法所得結果的可用性，並不消沉下去。許多人以為無論那種經濟的觀察法，只要牠由社會生活的整個上挖出來，決不會真實，因為牠根據由社會中抽出來的個人之行爲，確定這國民經濟的現象。所以由此而所得的理論，被謔爲原子主義 (Atomism) 和個人主義了。這派的人以為國民經濟的本質，不能從個人主義方面來認識，因爲這正是整個經濟的一部。經濟是一個合目的的組織，一個行爲的系統，這些行爲的基礎，不在個人的動機，而在整個的次序相依而成的制度上。所以經濟的本質在於整個內的，不是因果的觀察法，却是合目的的探究，才是正當。

代表這整體派 (Universalistische Schule) 的，是斯派 (Spann) (註三十) 這派固然與歷史派及其相鄰的諸派有接解之點，但決不是忽視理論，却是由目的論的立場上，將理論從新建造起來。

在德國，因不滿意以前的學說，而有觀照學說的成立 (anschauliche Theorie)。牠並不從事於國民經濟內部分的因果聯繫，而求了解本質了解統一的整個。因爲整個祇能在歷史的事

實中找求，所以牠很偏向歷史方面的。

自來的經濟思想，我們總算大概地敘述了。十九世紀的經濟學遺給二十世紀的，有三大爭執：在方法學上，有歸納與演繹之爭，前者以爲經濟科學的任務，先在尋找經濟歷史的材料，然後再讀理論，在歷史材料未找够以前，簡直可以不去管理論；後者則以爲這經濟理論，即在目前亦可適用，而爲國民經濟之必要的認識基礎。即在論理中，亦發生主觀和客觀的價值學之爭，這是第二種的爭執。第三種的爭執爲將來經濟社會組織問題，就是自由市場社會的信徒和代表科學社會主義者的爭執。

在方法爭執上，於二十世紀中之最初十年內，界限效用學說漸被承認，最後竟告勝利。歷史派的後起之秀，也反對其先師之純粹的敘述方法。他們或以歸納所得之認識，而作某個現象理論上之探究；或於歷史研究之基礎上，作巨大經濟階段的進展之敘述，而再以理論去解釋經濟階段的特質。前者最適用於景氣學之探究，法之余格拉（Clement Juglar）著有商業危機一書

“Des Crises Commerciales”；德之斯比特霍夫（Spiethoff）及美之密吃耳（W. L. Mio-

hell”著有“Business Cycles”等皆是。

至於第二派之代表，則屬本文所欲詳述之仲伯德。仲氏所著之「近代資本主義」共六大冊，係歷史地同時系統地敘述整個歐洲的經濟生活，由起始至現在。仲氏起初甚被馬克思所影響，而現在却變為一堅決的反馬克思學說者與反社會主義者了（註三十二）。然而他對馬克思於經濟學之貢獻，始終承認而尊敬馬氏。他雖然反對馬克思之唯物史觀，而以精神的原子去解釋資本主義，但是他自己却認為馬克思之繼承者和完成馬氏體系的著作者。對於這點，我們似未便同意：馬氏之著作係一個基於歷史哲學基礎上而絕對理論的著作；仲氏的之功績，却以歷史的敘述，調入理論的探討為特徵。

這樣，我們看似仲伯德是歷史派，却又和歷史派的新舊二支不盡同。他固然以歷史事實為根據，却又攙入理論探究而予以整理；他不如歷史派之固執於歸納方法，而以為有歸納之後必有演繹，歸納演繹必相互補充，這是他對於十九世紀遺下我們的第一個爭執的態度。他對於第二個主觀和客觀的價值爭執問題的態度，也很值得我們的注意。仲氏以為價值是一個人類假

定的東西，沒有具體的，故不可捉摸的；所以價值是沒有的，有的是價值觀念（Wertidee）。牠有主觀和客觀之分，自來爭執得非常厲害，仲氏以為並非選擇這個或那個的問題，却是二個都要的，彼此相互補充。第三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執，仲氏以為資本主義已入後期階段，具有牠後期階段的特徵，而應當實行「計劃經濟」（詳以下之「資本主義的將來」譯文）那末仲伯德整個思想體系怎樣呢？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他的大著「近代資本主義」全被他的體系所滲透，即使要了解他的「資本主義的將來」我們也非要先明瞭其體系不可。讓我來把他的體系，簡括地敘述於後：

B. 仲伯德學說體系概觀

仲氏以為經濟學說，雖雜亂無序，然而認識的基礎不外三種：形而上學的，自然科學的及精神學的基礎。因這基礎的不同，所以經濟亦分三大系統：形而上學的，或稱規準的國民經濟學

(die richtende Nationalökonomie) 自然科學的，或稱秩序的國民經濟學 (die ordnende

Nationalökonomie) 及精神科學的，或稱理解的國民經濟學 die (Verstehende National-Ökonomie) 但是這經濟學的三大思想，絕少純粹地見之於自來經濟思想中；換句話說，無論誰的思想系統，都不適合於規準的，或秩序的，或精神的國民經濟學，即使有之，也不過是例外罷了。仲氏以爲純粹之規準的國民經濟學系統，或可說托瑪思 (H. Thomas) 的系統；秩序的國民經濟學，是拍勒托 (Pareto) 的系統；理解的經濟系統，要算仲氏自己的了。可是大部分的經濟思想，都雜有上述的各種系統；如重農主義派及許多正宗派的學者雜有規準的和秩序的國民經濟學；歷史派的許多代表之系統，雜有秩序的和理解的國民經濟學；馬克思的系統，混雜這規準的，秩序的和理解的國民經濟學。

規準的國民經濟學不單確定事實的現狀，且更注意探究事實應當怎樣。所以牠認識的內容是「正則的經濟」(“richtige Wirtschaft”)，這就是說，一個適合於世界意義，人類任務及社會生活條件的經濟。探究這「正則的經濟」是這派的主要目的。這些把經濟科學建造起來的範疇，都是由這中心思想「正則的經濟」所演繹的，如公正價格，公正工資，公正分配，剝削等

的概念。經濟形成的合式與否，全恃其是否合於「正則的經濟」之原則而定。

屬於秩序的國民經濟學之經濟學者，爲數最多，不過他們自己沒有這個立場的意識，更沒有一貫地，用清晰的方法去發展他們的思想，却常常於發展去的思想中，雜有規準的或理解的國民經濟學的成分。代表這派的人，對局部分問題之意見常有參差，但是我們不可否認他們的共同之點：

1. 秩序的國民經濟學從事於「科學」——他們要認識事實而欲達到探究所得結果的公認性，所以他們棄去一切形而上學的成分，而爲主觀的價值判斷的敵對者。

2. 照這派的意思，精神科學（他們以爲國民經濟學亦屬此）與自然科學有同一的認識基礎，同一的認識目的和同一的認識方法。準確些說，他們以爲於認識自然中所試用的方法，無條件的應當以及可能用之於社會文化的現象上，尤其是經濟現象上。

3. 他們認自然科學爲比較完全的科學，其中最完全的是「精確」的自然科學。後者是科學中的科學理想，也是國民經濟學的科學理想，最少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部分或「純粹」

理論部分的科學理想。

根據以上的觀點，所以該派最高的認識目的在於「法則」的發明。一般的「法則」是「一般的事實；」這是說，照例重來的事實，是正當的「自然法則。」

從此國民經濟學的理论者以製造法則爲他們最尊貴的任務，亦即科學的最大功效。這種意見，我們可以一致地在勒穆 (Muller)，凱爾納思 (Cairnes)，耶方斯 (Jevons)，馬克思 (Marx)，孟格 (Menger)，拍勒托 (Pareto)，歐本哈滿 (Oppenheimer) 等思想中找到。

理解的國民經濟，仲氏以他自己爲代表。他以爲國民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却是文化科學 (Kulturwissenschaft) 或精神科學。他於他的著作末段(註三十二)結束地說：「誰從事於規準的國民經濟學，那末他把經濟學出賣給哲學了；誰從事於秩序的國民經濟學，那末他把經濟學出賣給藝術學 (Kunstlehre) 了。因爲倘使我們真真要一種像精確的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那末我們的探討，只有在牠予人們以實際利益的條件下，才有價值。可是這個只是在限制的範圍內可能，我已經指明了。這樣說來國民經濟學已沒有意義了。倘使我們悟及經濟學是一種精

神科學，牠帶着本身的價值，然後牠才有意義。國民經濟學應當是一種科學而不是一種救濟學（Heilslehre），一種科學而不是藝術學，一種科學而却不是自然科學。」

我們明白了仲氏經濟學的三大系統以後。現在再進一步敘述每一系統的內容。

以探究事實之應當如何為己任的規準的國民經濟學，因其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不同，可分為三支。我們也可說，這三支均由這特別的自然權利（*Naturrecht*）發生的。更須確定的是：這三種不同的哲學態度，被三種不同的宗教信仰所適合着。一神教（*Theismus*），自然神教（*Deismus*）及汎神教（*Pantheismus*）（無神論 *Atheismus*）差不多適合這規準的國民經濟學的三支：建基於神學之哲學者（*Scholastiker*）和諧論者（*Harmonisten*）和唯理論者（*Rationalisten*）。

建基於神學的哲學者，第一個要算亞里斯多（*Aristoteles*），他以為經濟僅是一種手段，曾經說：「財富是有益的並且是為別一種目的而存在的」（註三十三）。亞氏分二種經濟行為，一種是滿足合理的需要之經濟，這是「正則」的經濟；他種是無益的不許可的經濟，就是為盈利

的經濟，如爲利息而作金錢借貸等。到了中古時候，基於這個基礎上的國民經濟學，已登峯造極，其代表最著者爲十三世紀的 Thomas von Aquino 和十五世紀的 Antoninus von Florenz 和 Bernhard von Siena 了。他們把人類的社會及人類的經濟列入天神的世界計劃中去，這天神的世界計劃就是「永久的法則」。他們的「正則」的經濟之基礎，築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他們適應當時的需要向三方面去研究經濟過程：貨幣制度，價格造成，和信用制度。

這派在十九世紀的代表者，要算羅蒙派的米勒 (Adam Miller) 了。米勒稱經濟爲「可吉可禍可福可災的科學」(註三十四)。他的認識目的爲「正則」經濟的本質，達到這個目的的路徑，聖經已經啓示我們了。就是斯派 (Spaer) 也是屬於這派的。他鄭重地說，科學不單探討事實，且亦探討事實應當怎樣。他也要求「正則」的經濟。「個人主義，學派所鄙棄的公平價格的定義，必須再受尊敬。牠是種根於每一經濟整個的正則的構造概念中，最後種根於正則的經濟概念中」(註三十五)。到這個認識目的的路徑，亦由這個基本神學的哲學所指示，這是斯派的中心概念：「整體主義」(Universalismus)。

準規的國民經濟學之第二支爲和諧論者，這也是十八世紀的一種社會和經濟哲學，與天主教的主教的社會哲學適相反。

當時世界觀變更了：中心點不再是神而是人了。世界秩序的「法則」不再是由神制定的，告誡而是管掌自然的了。「法則」二字的意義，也有變化：牠不再是規條，不再是法律的或風俗的條例，却是自然變化的通例了。所以服從「永遠法則」並不因爲尊敬上帝，並不因爲上帝的意志要求我們服從的，而是爲人們達到本身的幸福。服從「自然法則」保證人類最高的幸福，現在並不像從前服從上帝告誡時之拘束天性，現在却是無顧慮的發展天性。天性應當任其發展，然後在人類社會中有完美的和諧。笛卡兒 (Descartes)、牛頓 (Newton) 及羅騷 (Rousseau) 都同意這個思想。「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 正是按照牛頓爲天星發明的自然制度之模型而成立的。

這樣，「自然秩序」的學說代替從前的自然權利了。

在這自然秩序上，建築了規準的國民經濟學之各派的基礎。第一是重農主義派，以克內

(Quesnay)爲代表，受這自然秩序極大的影響。這「自然秩序」的研究，必然地發明「正則」的經濟。國民經濟學的任务，在找到這「正則」的經濟，然後制定作爲經濟態度的方針。當然，那一種經濟才適合於「自然秩序」，那個才是「正則」的經濟，對這個問題，意見頗不一致。

起初，「自由經濟」——說明白些，「自由的交通經濟」——因得「自由秩序」之助而被發現，牠被認爲「正則」的經濟；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 和孟鳩斯脫精神都建基於這「正則」經濟的意見上。重農主義的學說，許多正統派學者的學說，尤其是亞當斯密的學說，都不出乎此。據許多學者（註三十六）的研究結果，這天神預定的和諧的思想，在亞氏一七五九年著作「道德的情緒」 (Moral Sentiments) 中，最爲顯明，即一七七六的「原富」亦被這思想所貫通，正在這個思想上，建基於亞氏的系統。亞氏主張自利 (Eigennutzen) 的理由，也不外因自利可達到社會關係的和諧。

孟鳩斯特精神的別一派爲哥森 (Gossen) 所成立的快樂說學派 (Hedonistische Schule)。這派也脫不了「自然秩序」的信條：「上帝的不可勝數之恩賜，把世界爛燦地安排好，使

人們達到最高的快樂，人們真能過游惰生活，祇要人們認識和服從他的法則」（註三十七）。這個法則哥森以爲他所提倡的界限效用法則。

前邊已經提過，這「自然秩序」可以作各樣不同地解釋。各派都根據這點而訂出經濟態度的方針，即反自由的國民經濟學之社會主義者亦然。他們有些是有意識地，有些是無意識地代表這個自然秩序，代表這個保證人們幸福的自然秩序，模勒里（Morelly），富利賢（Fourier），哇文（Robert Owen），馬克思（註三十八）等皆是。

社會主義的學者，與重農派正統派一樣，也造成了（規準的）國民經濟學之系統，不過他們認爲「正則」的國民經濟，與重農主義派正統派，界限效用說派宣示的自由之交通經濟，大有參差，尤其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一點，他們加以否認。

就是提鈴克（Eugen Dühring）（註三十九）和歐本哈滿（Franz Oppenheimer）（註四十）的系統，仲伯特也以為不出這個「正則」的經濟。歐本哈滿的系統，當然不是一個純粹形而上學的系統，除外尚包含自然科學的成分。

規準的國民經濟學之第三派爲唯理論者，這是一種社會哲學，尤其是經濟哲學。他們由人類的理性，去演繹實際態度的方針，牠不單把理性當爲認識手段，且視爲決定應當如何的根據之來源。這「正則」的經濟，照這派的意思卽是合理的經濟。

唯理論盛行於德國，以德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哲學爲基礎，受德國哲學家康德，非希德（Fichte），黑格耳（Hegel）及阿倫思（Ahlrens）的影響。根據康德的理性法（*Vernunftrecht*）（註四十一）在社會中應當有：1. 私有財產，2. 締約自由和 3. 遺產法的存在。他的「正則」的經濟應當有 1. 貨幣和商業交通，2. 呈有利息，抵押，擔保等之信用交通及 3. 工資關係。非希德的「正則」經濟含有 1. 私有財產，2. 國家對礦業及林業的至上權，3. 一個拘束的經濟。我們可以說：一個大部基於手工業基礎的計劃經濟，在這個計劃經濟中，有 a. 行會秩序，b. 最高價格的規定，c. 不與外國往來，取閉關政策及國家的商業專利。阿倫思亦以爲「正則」的社會有 1. 私有財產，2. 遺產法，3. 締約自由。至於黑格爾的「合理」社會，由不同的成分組織的：1. 早期資本主義的特色，2. 理想社會的特色，3. 各種社會必須的成份：私有財產，身分等級之三分，及自由競爭。

第二大系統是秩序的國民經濟學，牠是以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去應用於經濟科學上。大一部分的所謂「理論」經濟學，屬於這派，不過他們都不認識自己的立場的特色，更少發展，成一純粹的秩序國民經濟學，大多與規準的或理解的國民經濟學或二者相混雜。比較起來最清晰及最純粹的系統，要算穆勒、約翰、凱爾納和孟格了（註四十二）。

這以自然科學方法去研究國民經濟學的系統，仲氏亦分爲三派：

1. 客觀論者 (Objektivisten)，以客觀的大小（貨幣數量，貨物數量，勞工數量）之變動，去解釋經濟現象。屬此者有重農主義派，正統派，及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尤其是陸排拖斯 (Rodericks) 和馬克思。

2. 主觀論者 (Subjektivisten)，以經濟現象之變化，歸之於心理。界限效用學說派，尤其這派的耶方斯、孟格、維實 (F. V. Wieser)，馬夏爾 (Alfred Marshall)，克勒克 (John Bates Clark) 屬之。

3. 關係論者 (Relationisten)，放棄經濟生活現象之質的探討，而欲以一個「關係」學說

或等量學說去代替因果溯源的觀察方法這派以數學派著名，其代表者，爲瓦爾拉 (Walras)。

拍勒托 (Pareto) 愛奇完斯 (Edgeworth) 熊彼得 (Schumpeter) 等。

主觀論者由聯想心理學 (Assoziationspsychologie) 出發。所以穆勒約翰說，國民經濟學乃「一道德的及心理的科學」(註四十三)，以爲牠必須建築於人類精神生活的「一般」法則上。心理學證實人類有他們的本性，最大的是「自利」在經濟方面說來，自利即「財富追求」到了馬爾薩斯發現「繁殖」的本性，好久來自利與繁殖性爲二種基本力量，彼此相互影響——其作用反射於市場上——造成經濟生活的整個機械體。在最後數十年，又發現了一個精神生活的根本事實，即利益計算。我們知道，界限效用說的特質，是以經濟的變化，歸之於這簡單事實的作用，即歸之於有利與無利。

客觀論者，則不山人類精神出發，却根據經濟生活現象之事實。起初人們以貨幣的大小 (如 Tableau Economique 所載的) 以後以在貨物內結晶的人工來觀察。這個勞工費用李嘉圖，陸排拖斯及馬克思便以爲形成及管理經濟世界的。

介於這客觀論與主觀論之間的，是關係論，其最著名的代表是帕勒托（V. Pareto）他固然要脫離心理原子，可是他沒有完全成功。他所定 *Ophelimita*（*ophelimita*）的概念動搖於主觀論的和客觀論之間。

仲伯德以為祇有這第三派，關係論者或作用論者（*Funktionalisten*），就是數學派的信徒，有一貫的清晰的學說。所以他們值得尊敬，值得被人稱為「精確」的探究者了。

至於這第三系統的國民經濟學，即理解的或精神科學的國民經濟學——仲伯德以他自己為代表——仲氏特別詳細析述。仲氏先證明反正統派，尤其是歷史派，責備正統派的六點之不合理。這六點是：1. 唯物主義（*Materialismus*）；2. 原子主義（*Atomismus*），個人主義；3. 解決問題的絕對性；4. 經濟現象之單獨的觀察；5. 靜態的觀察方法；6. 從演繹法則出來的經驗材料之不充分。反正統派之反對正統派這幾點，正顯露其弱點，正表示其不知正統派原則上的錯誤何在。正統派的錯誤在其自然科學的着眼點，正是這自然科學的着眼點，也支配反正統派的思想，最少支配歷史派的有名代表：從陸隙（*Roscher*）到許模勒（*Schmoller*）。他們一致地以

爲國民經濟學之任務，在於觀察豐富的經驗材料，以達到確立法則之結果，所不同者，僅如何達到法則的探究方法而已。所以他們的立場是：國民經濟學的目的，在乎法則之發現，就是確立經濟過程的有規則性。至於法則概念，並沒有變更，不過現在多用些「發展法則」(Entwickelungs-*gesetze*)，就是「進展之變動的法則」，不是以靜態爲前提的法則。就是以法則的「相對」的有效，(就是常因歷史的，國家的，精神的變更而與之變更)去代替「一般的，絕對的及不變的自然法則」，然而這並沒有變更「法則概念」。

所以仲伯德結論地說，十九世紀的國民經濟學，造成了一個統一的自然科學的戰線，從克內到陸際，從李嘉圖到許模勒，都跳不出這條戰線。他們都被這線索所綁住，不過有不同的記號罷了。到後來「方法爭執」爆發，明確地說，幾十年來這二大派爭執變爲二個領袖的爭執，還免不了以認識論，方法學去證明同一立場，誰有較尖銳的，較好的論理武器，誰即勝利。無疑的，孟格和許模勒二人的短兵相接，結果是孟格佔勝。雖然我們對戰敗之許模勒有無限的同情，承認他反對孟格的方法是對的，然而他不能證明牠。雖然他爲一較好的物件鬥爭，然而他尙不知此物

件爲何物，他沒有提到進攻敵人的觀點。

精神科學的成立，仲氏以爲並不靠以前所讀的經濟學者，却歸功於其他科學之學者，尤其是維谷（Giambattista Vico），他有意識地把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對立。國民經濟學所運用的精神科學的方法，仲氏以爲經過三個時期：1. 素朴的，2. 批評的，3. 建造的時期而造成了。可是有意義的精神科學之國民經濟學之造成，有三種阻礙，仲氏稱之爲心理主義（Psychologismus），歷史主義（Historicismus）及目的主義（Teleologismus）。第一種以國民經濟學爲心理學之一部（以心理學爲「基本科學」，所以有人稱經濟學爲「應用心理學」，孟格稱之爲「心理學中尙未造成之一支」等。第二種以自然科學和歷史對立；第三種以爲經濟學者不能安置經濟現象於「因果」的範疇內，却歸在「手段——目的」的範疇內。把這三種障礙，三種錯誤的意見屏除後，仲伯德然後建造他所代表的精神科學的國民經濟學。

仲伯德先確定國民經濟學係1. 經驗科學，（帶空間性和時間性的真實屬於其研究對象內），2. 文化科學，3. 社會科學。然後他建築他的系統。在未作系統以前，必先有一觀念，卽一種想

像。這造成系統的觀念，必須選擇。仲伯德以爲國民經濟學之造成，必須有三種觀念：1. 根本觀念 (Grundidee)，2. 形成觀念 (Gestaltidee)，3. 工作觀念 (Arbeitsidee)。

經濟的根本觀念，在於戰勝自然，在於滿足需要。經濟的內容，不外包含三種成份：

a. 經濟思想或主觀的精神，就是一切決定經濟的人們之標定目的，動機和態度之條例。
b. 秩序。一切經濟的動作是「有效」的動作，而是——因爲人是共同生活的——一個介於無數人間的動作。但是許多人之間即刻會有理性的動作，那末這個（主觀的）爲動作所循的計劃，需要客觀化了，然後這計劃當爲許多人的指示方針。一個客觀化的計劃，我們稱之爲秩序。因此秩序是經濟所包含的第二種成分。我們亦可稱之爲經濟生活之方式。

c. 技術。因爲經濟的目的在貨物的造成，所以人們運用方法，把自然界的物產，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這種手段或方法，我們稱之爲技術，牠也是經濟過程的成分。

譬如紡紗是經濟生活的一個現象。屬於此者如經濟主體之目的確定，及決定態度的原則——目的爲營利或滿足需要，合理化經營或照傳統方法經營等等（這是經濟思想。）其次，尚

有與工人及主顧之來往，這來往循經濟主體所訂定之秩序內發生的規則進行，締結合同等（這是秩序。）復次，尚有紡紗之整個過程：原料品之製成，用機器或工具改製的原料品，原料品或製造品之包裝及運發等（這是技術）。

造成系統的第二個成分為形式觀念。「經濟生活是一個有空間性與時間性的事實組合，各種文化，及各種經濟，倘使是真實的，那是歷史了。經濟的觀念，常常在一定的經濟現象內結晶着：歷史上經濟總採取方式的，是形成的，客觀的精神」（註四十四）。仲伯德謂沒有抽象的經濟却有一種一定樣式的，歷史上特別的經濟。

各種文化科學的任務是在找求方法與路線，以探究文化現象之歷史上的特點。所以我們應當提出牠在歷史上的實際而決定牠在歷史上的地位。正如言語科學用內部的語言方式之觀念，美術科學用美術的體制之觀念，去決定牠們歷史上的特點；經濟科學也需要這種形成的觀念，去安置其材料於系統中。這種觀念是用來了解某一時期經濟生活之原則上的特點，並與其他經濟階段之經濟形式分開，因之而分割人類經濟的歷史上的大的時期。

「一個觀念，牠能够將經濟現象形成一個系統，必須直接從經濟的觀念本身中演繹出來，牠必須包括經濟的特色，且歸併各種特色成一單位，這不在抽象的思想上的方式，却在牠具體的歷史上的決定」（註四十五）。

經濟制度的觀念，可適合這些要求。經濟制度是一個包含有意義的單位之經濟方法，在這經濟方法內，每一經濟的根本成份，呈示一定的形式。造成經濟概念的根本成份，前邊已經講過是1. 經濟思想，2. 秩序，3. 技術。這樣我們能够詳細決定經濟制度的概念：這是一個視為精神單位的經濟方法，第一，被一個一定的經濟思想所支配，第二，有一定的秩序與組織，第三，運用一定的技術。

仲伯德鄭重地申說，國民經濟學之為科學，與經濟制度的觀念共其存亡。倘使沒有形式觀念，那末牠簡直不是科學了；而除了這經濟制度的觀念外，再沒有別一個同樣有用的形式觀念了。

系統所必需的第三個成分為工作觀念（Arbeitsidee），這是一個理智的概念，牠幫助我

們在根本觀念和形式觀念所造成的範圍內，把經濟的認識材料分門別類起來。

這個工作觀念，仲氏亦分爲三類：a. 探解經濟生活的管轄區域之觀念；b. 探解經濟連索的觀念；c. 價值觀念。屬第一類者如靜態和動態的觀念，實際性（Aktualität）和潛藏性（Potenzialität）（「財富」之實際性爲貨物量，潛藏性爲生產力）的觀念及進展的觀念。仲伯德的「近代資本主義」巨著之敘述，即被這進展的工作觀念所支配。至於這工作觀念第二類的探解經濟連結的觀念之目的，係指示我們，在如何方式中經濟的人們，彼此連結及經濟現象彼此間如何關係。這些不外歸原於有機體——機械體的一對觀念了。人們可以想像經濟生活爲一有機體或一機械體，不過同時要明白，這不過一個假定而已。事實上，經濟生活既不是一個有機體又不是一個機械體，而是一個特有的，以生人爲成分的組織。我們祇可看他好像一個有機體或機械體。至於第三類的價值觀念，如要插入這精神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話，仲氏以爲只好插入於工作觀念內。

以上三種觀念即根本觀念，形式觀念和工作觀念，仲氏以爲造成經濟學系統的必要成分。

經濟學的整個，仲氏分爲三大部：（一）經濟哲學，（二）經濟科學，（三）經濟技術學。

（一）經濟哲學包含1.經濟本體論，2.經濟的文化哲學，3.經濟倫理學。

（二）經濟科學係一經驗科學，探討經濟生活範圍內的狀況，其過去，現在與將來。各國稱這個探究方法爲科學，這經濟科學爲經濟全部之最重要部分。牠可照以下觀點去分類：1.照研究對象的根本之上之着眼點；2.照研究範圍的觀點；3.照挑選的工作觀念。

1.照根本的着眼點，經濟科學分二部：理論和經驗。我們要懂得理論是什麼東西最好要明白牠所負的各種任務。照上面所敘述的原則，一個完全的理論，欲求：（一）科學的整個系統；（二）於經濟系統內，插入一個適當的概念系統；（三）製造出一廣義的法則學，我們可稱爲「可得想像的學說」(die Lehre von den Denkbarkeiten)。牠包含三種成分，就是：a.可能性的學說；b.多分性的學說；c.必然性的學說。這可能性，多分性和必然性的學說，仲伯德很起勁地應用着。他的「盛期資本主義」中之第三部第一節，完全應用這些學說。卽在這本「資本主義的將來」小冊子內，仲氏亦應用牠們。可能性的學說，給事態一得以想像的可能性之大概。多分性的學說

指出事態的趨勢。必然性的學說是意義法則(SinnGesetzmässigkeit)的學說，意義法則是由意義演繹出來的法則。各種經濟法則都帶着這個性質(註四十六)。

至於經驗，則與理論相反，亞里斯多早已指明。經驗是時間與空間的現象之了解與敘述。在文化科學範圍內的經驗，我們便稱之為歷史科學。講到理論牠探討可能性，多分性和必然性，這是沒有空間和時間性的；經驗却探索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真實。

2. 照研究範圍的觀點，經濟可分普通經濟與特殊經濟。仲氏以為前者係各種經濟共有的思想疇範之學說，後者為經濟系統的學說。仲氏以為彼之「近代資本主義」亦屬於特殊經濟。

3. 照選良的工作觀念，而有交換社會的觀念和國民經濟學的觀念。因這兩個觀念，人們就稱作社會經濟學及國民經濟學。

(三) 經濟藝術學。牠是一個手段的學說，用作促成某一實際的目的。在過去時，漸漸造成三種不同的藝術學。牠們是：1. 私人經濟學，2. 以財政學著名的國家經濟學，以及3. 「實際」的國民經濟學。後者為欲「改良」國民經濟而制出的各式各樣計劃之聚匯。

仲伯德於其著作「國民經濟學」最後一篇中，分析科學和藝術學之關係。他說，文化科學中之科學和藝術學的關係，與自然科學中之科學和藝術學之關係，根本不同。自然科學所製造的「規則」，由藝術學應用之，所以自然範圍內的藝術學得自然科學所賜予的「規則」，而有實際效用，所以牠有「進步」了。自然科學的意義，不外予藝術學以規則，使工業進步，假如沒有實際的使用，這種自然科學簡直沒有「意義」了。

文化範圍內的科學與技術學之關係，完全不是如此。仲氏反覆說明後，斷定文化科學（經濟科學）決不能成立被藝術學循此工作的規則。不過這並不說經濟科學不能襄助經濟藝術學。前者很可襄助後者，不過採取不同的方法罷了。經濟科學可幫助經濟藝術學之數點，仲氏列舉如下：

1. 經濟科學固然不能給予答案，可是能够提出詢問而指出重要的問題及指示其連繫；
2. 牠可由其系統與概念，使藝術學者之腦海中，生有秩序。
3. 牠可指明意義法則，而標示實際行爲之效用的界線。

仲伯德歷舉培根(Bacon)、笛卡兒(Descartes)及尼采(Nietzsche)等哲學家之思想，證明科學的意義不必在於贏得實際的效用，如自然科學然，却可以用別種方式，有利於人生。自然科學的探討在於成立最有力度的法則，精神科學的探討在欲造成完全善的人生和諧之任務。精神科學中之國民經濟學，仲氏以為僅有一部分之「實際效用」，而其他部分之意義，在造成精神的組織，這組織自己含有價值，正和美術品無異。精神科學尚有促進文化之任務，當我們從事於這種科學，同時也是實行一個「文化人」的任務，正與從事於美術學及哲學中的倫理學之不求其實際效用一樣。

仲伯德堅決地認國民經濟學為精神科學，反對人們以牠為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也反對建基於哲學上及自然科學上的規準的和秩序的國民經濟學。仲氏的認識與衆不同，所以建基於這個認識上的國民經濟學系統也與人有異。各派的經濟學，不外受形而上學，自然科學及精神科學三種的認識基礎所支配，然而沒有一個（托媽思和拍勒托除外）根據三種中某一種認識而一貫地發展其思想系統，却錯雜了二種或三種認識，所以他們的系統是不純粹的。托媽

思和拍勒托，不失爲清晰的一貫的學者，然而其一以形而上學，他一以自然科學爲國民經濟學的認識基礎，他們都沒有認識國民經濟學是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仲伯德在他著作「國民經濟學三大系統」結論中說：「誰從事於規準的國民經濟學，那末他把經濟學出賣給哲學了；誰從事於秩序的國民經濟學，那末他把經濟學出賣給藝術學了。因爲我們倘使真真要一種像精確的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那末我們的探討，只在牠予人們實際利益條件下，才有價值。可是這一個只是在限制的範圍內可能，我已經指明的。這樣說法，國民經濟學沒有意義的了。倘使我們悟及經濟學是一種精神科學，牠帶着本身的價值，然後有意義。國民經濟學應當是一種科學而不是救濟學，一種科學而不是藝術學，一種科學却不是自然科學。」

我們認知了仲氏在各派學說中的地位和其經濟思想體系以後，進而讀他的「資本主義的將來」。這本小冊子的內容，係仲氏思想的結晶（註一）。他的研究方法，完全根據他的系統而來的。

這本「資本主義的將來」除前段的緒言和末段的結論外，全書共分三章。前段的開宗明義幾句，正是仲氏思想的綱要，往後指示科學家的任務：確定可能性，多分性，必然性，作以後三章正文的遵循所自。末段呼應前段，再鄭重地——不過交換字句——將前段內的綱要重複一篇，且督促人們堅強其意志，改革現在的經濟生活。

於第一章內，仲氏先敘述及確定資本主義的現狀，謂資本主義已經於三方面發生變化了：1. 於經濟的精神方面，2. 於秩序方面，3. 於技術方面。因這三方面的變化，仲氏按他的經濟階段的系統，認為現在的資本主義，處於後期資本主義時代。

於第二章內，仲氏探究資本主義的將來。資本主義將來的形成，仲氏以為有三種可能性：1. 保守，2. 反動，3. 改革。仲氏研究之後，以為前二者都難能，所以祇可站在第三個的改革立場了。從前的經濟，以無計劃的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專制為特徵，現在的經濟以無計劃的拘束為特徵，所以將來的經濟，必須要有計劃的，這就是仲氏在改革立場上所企求的。有幾個特徵，是計劃經濟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是包含一切的特徵；第二個是統一的特徵；第三個是五花八門的特徵。而計

劃的目的和方向，亦因國民之大小，社會結構之不同，及人民之性格，文化程度之高低，與一國特殊的歷史而各異。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經濟制度問題。仲氏證實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內，還存在着其他一切的經濟制度（農村經濟、手工業經濟等）；將來如實行一完全的計劃經濟，亦必存有以前一切的經濟制度，並存而不悖。仲氏竟以為私有財產與集團財產，私有經濟與集團經濟將並行存在着，且必須存在着。最緊要的是一個整個的計劃，沒有整個計劃，一切都是混亂啊！

在第三章內，仲伯德謂經濟生活之將來如何形成，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將來，多少也被各民族相互間之經濟關係所決定。仲氏無顧忌地說：「高期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以西歐之剝削世界為特徵，這是有三種前提的。可是這三種條件現在是沒有了，即將來亦不再會發現。西歐的舊資本主義國家，只好在自己拘束自己中，即自足化中找出路，不過這個「自足化」的概念，仲氏以為非欲與世隔絕，閉關自守，却是不仰給於外國之農業品，即欲再度農業化。倘使德國農業人口再恢復到一八八二年之佔全人口百分之四二，那末德國工人失業，化之於無形了。」

這「資本主義的將來」據譯者所知，為仲伯德主要著作被介紹中國來之第一資本（註四）

十七。倘使因此而引起讀者研究，這世界著名經濟家的學說，或竟進一步有助於「資本主義的將來」這個問題之解決，那是給譯者無上的報償了。

(註一) 見仲伯德序言。

(註二) 見“G. Schmoller, Histor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Staatenbildung und Finanzentwicklung.

Schmollers Jahrbuch XXXI. Jahrg. (1906) S. 1-64”。

(註三) 克內最有名之著作爲“Tableau Economique”。

(註四) 此字來自希臘文，意爲自然也。

(註五) 亞當斯密之名著爲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776)。

(註六) 李嘉圖之最要著作爲“On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axation”。

(註七) 賈氏之最要著作爲“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註八) J. S. Mill 之最要著作爲“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

(註九) 馬爾薩斯之名著爲人口論。

(註十) James Mill 與 J. S. Mill 之父著有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註十一) Senior (1790-1864) 著有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註十二) Cairnes 著有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Essays" 等。

(註十三) 西斯穆提的主要著作爲 "Nouveaux Principes d'Economie Politique" 1819 第一版 "Etudes sur l'Economie Politique" 1837. 阿氏被視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先鋒。

(註十四) Rodbertus (1805-1875), 其主要著作爲 "Die drei sozialen Briefe".

(註十五) Lassalle (1825-1884) 以宣傳家著名, 其經濟學說受馬克思與陸排施斯所影響。其著作則多法律及哲學方面, 經濟方面之著作無可足述。

(註十六)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1809.

(註十七)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爲李士德之重要著作。

(註十八) 陸陳之著名著作爲“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dI-V “Ansichten der Volkswirtschaft aus de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1867.

(註十九) Hildebrand 的著作爲“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der Zukunft.” Frankfurt 1848.

(註二十) Knies 的著作爲“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 Braunschweig (umgearbeitet unter neuem Titel 1883)

(註二十一) Schmoller 的著作爲“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Bd I-II. Leipzig 1900-1904.

(註二十二) 見上書。

(註二十三) 耶方斯之著作，由德文譯出在“Sammlun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Meister” 第六卷二十三本。

(註二十四) 瓦爾拉之著作爲“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Paris et Lausanne 1889 (1926年新版)。

(註二十五) 孟格之著作爲“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Wien 1871 (1923年第二版)。

(註二十六) 洛桑派由瓦爾拉所創造，再由帕萊托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繼續建造。除法國外，有意之 Barone 及 Androsso 爲信徒。瑞典之維克在兒 (Knut Wicksell 1851-1826) 走類似的路。即卡薩兒 (Gustav Cassel) ——雖然他反對界限效用說——與瓦爾拉有許多相同之點。

(註二十七) 維也納派由孟格首創，得維也 (Friedrich Frh. V. Wieser 1851-1926) 扁寶威爾 (Eugen Böhm V. Bawerk, 1851-1924) 及菲力泊維去 (Philippovich 1858-1917) 之贊助。該派現在以馬賢 (Hans Mayer) 爲領袖。青年學者如 Hayek, Landauer 等附從之。

至于德國，雖以前有杜寧 (Johann Heinrich V. Thünen 1783-1850) 之數學的探究方法，及哥森 (Bernhard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 之成立慾望飽和之根本法則，可是這數學派和維也納派，都不能有任何發展，這是因爲和德國的精神不甚融洽的緣故。海爾曼 (Friedrich Benedikt Hermann 1795-1868) 提赤耳 (Dietzel 1857年生) 及魏格納 (Adolf Wagner 1835-1917) 法國經濟學 著之名代表，却跟着——果然帶着保留——正統學派走。

(註二十八) 界限效用派之著名書籍介紹如下: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3. Auflage. Berlin 1927.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Wien 1871 (Seitdem 2. Auflage 1923).

Wiese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2. Aufl. Tübingen 1924.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 Aufl. Innsbruck.

Mathematische Richtung:

Walras,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Pareto, *Manuale di Economia politica*. Milano 1906.

Schumpeter,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1908

Barone, *Grundzüg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übersetzt V. N. Staeble.

Bonn 1927.

(註二十九) 方法爭執之重要書籍如下：

Meng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1883.

Schmoller, Beiträge zur Methodik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uch für Nation-

alökonomie Statistik.

Hasbach, Ein Betrag zur Methodologie der Nationalökonomie. Schmollers Jahrbuch

1885.

Hesse, Gegenstand und Aufgabe der Nationalökonomie. 1926.

(註三十) 斯漢之重要著作爲“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3. Aufl. Jena 1923” 敘述該派

的目的，尚有“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係以敘述經濟學說派別爲任務。

(註三十一) 見仲氏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第十版，此書係由仲氏以前

之「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改變內容及書名而來，製成上下二厚冊，與仲氏于 1895 年所出之「社會主

義與社會運動」一冊，內容大不相同。

(註三十一) Sombart,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ünchen und Leipzig 1930. S. 342.

(註三十二) 同上，第二十四頁。

(註三十四) 'Die Wissenschaft von Heil und Unheil, von Sagen und Fluch' von Adam Müller, Gesammelte Schriften. 1839. S. 8f.

(註三十五) Othmar Spann, Tote und lebende Wissenschaft. 2. Aufl. 1925. S. 42 ff.

(註三十六) 羅賓斯著，Hasbach, Bonar, Brief, Surányi-Unger 及 Jastrow 譯。

(註三十七) 見 H. 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1854.

(註三十八) 見仲伯德之『無階級社會主義』(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2 Bände 1924.

(註三十九) 見 Eugen Dühring, Kritische Grundlegung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66 S. 481.

(註四十) 見 Franz Oppenheimer, 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 2. Aufl. 1911 S. 84.

(註四十一) 見康德名著 'Metaphysik der Sitten' 第一編第三章。

“Die Rechtslehr ist das, wovon ein aus der Vernunft hervorgehendes System verlangt wird”; “Die Vernunft gebietet, wie Gehandelt werden Soll, wenngleich auch kein Beispiel davon angetroffen Würde”

(註四十二) 仲伯德著眼的書籍如下:

J. S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1844 2. ed. 1874.

J. F. 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6. 3.

Auflage. 1888.

Carl Meng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1883.

(註四十三) J. St. Mill,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g. 133.

(註四十四) 見仲伯德之『三大經濟系統』第一百八十三頁。

(註四十五)第一百八十四頁。

(註四十六) 見仲伯德之「三大經濟系統」第三百頁及二百五十三頁及其以後頁數。

(註四十七) 聞仲氏于一八九五年初版之「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一書，有人已譯過。惟此書現已由仲氏改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上下共二冊，其內容與以前大不相同。此二書的比較，可窺見仲氏思想改變之一斑。故「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不能代表仲氏的經濟思想了(參觀註三十一)。

著者序

這本小冊子之著成，係根據我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貨幣及信用經濟研究委員會」之講演。當時聽講者，非常踴躍，使我感到有寫下我的思想之必要。但當時我的講演僅根據手稿摘要，所以這本小冊子文筆的構造和演講的表面形式，不免略有參差之處。惟內容則並無變動，係總括我數年來於各處所代表的意見。

維納仲伯德

一九三二年，柏林。

目錄

仲伯德在經濟學上之地位及其學說體系（代序）	一—五三
A. 仲伯德在經濟學之地位	
B. 仲伯德學說體系概觀	
著者序	
緒言	一
第一章	四
第二章	九
第三章	二六
結論	三七

資本主義的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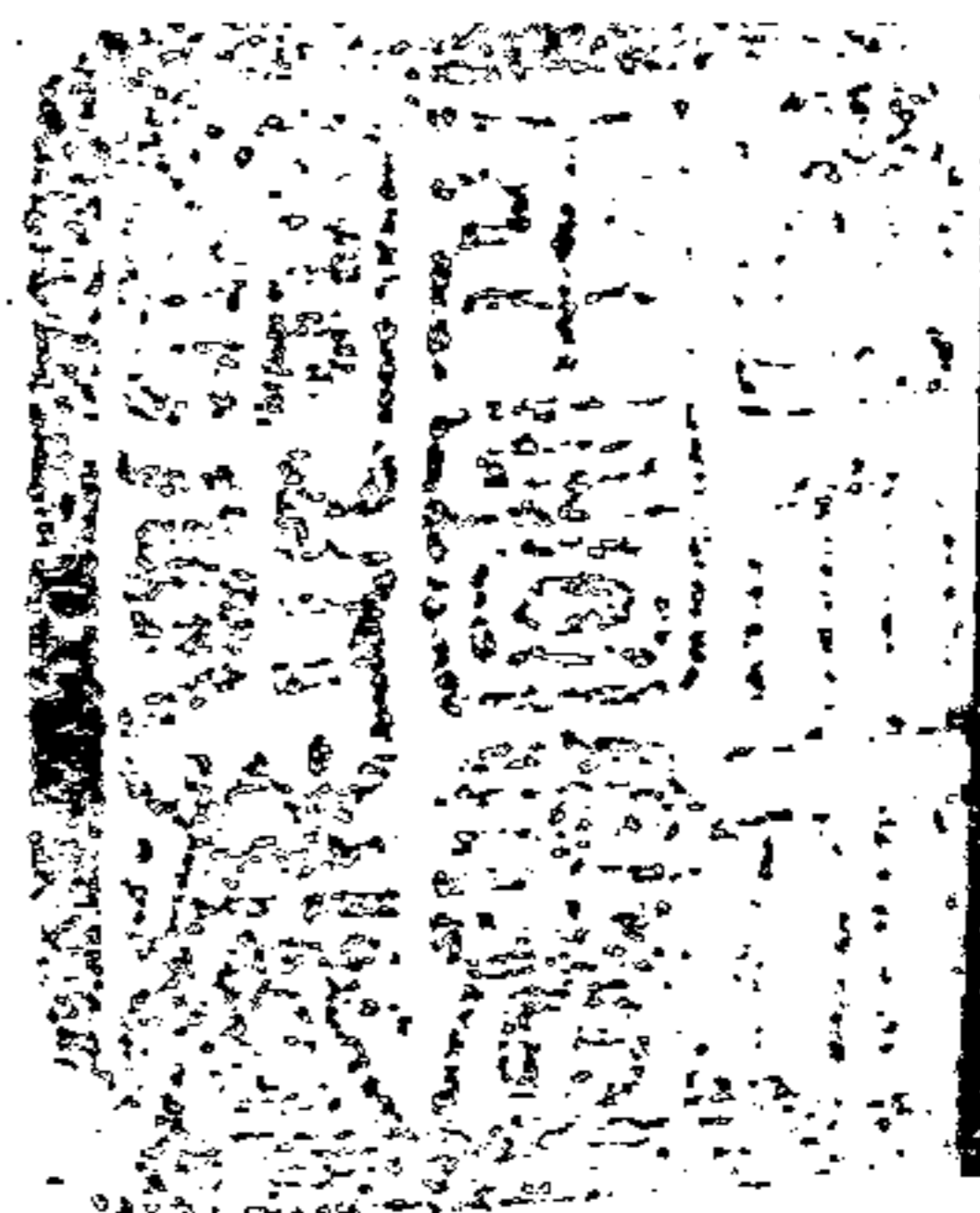
緒言

經濟不是我們的「命運。」

「經濟的本身法則」是沒有的。

要由「強制的範圍跳入自由的範圍」我們用不着等待共產主義的。

這是說：經濟不是自然過程（Naturprozess），而是一個由人類自由的決斷所形成出來的文化組織，自來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因之經濟的將來如何及某一種經濟制度的將來如何，也視自由願意的人們之斟酌如何而定。（人們實行其目的時，當然被自然與精神所規定的必然性所拘束。）



由此看來，經濟將來的形成，最主要的不是知道的問題（Wissensproblem），却是一個意志的問題，所以與這些科學家不相干，因為他們不去問事件之應當如何而僅滿足於確定事實之現狀。

那末，難道我們不能以科學的意義談將來麼？即使我們沒有「預斷將來」的特別天賦？我相信我們能夠的。祇要我們記着以後因之而生的使命。我所認為的使命，寫在下面。

我們科學家可以確定：

1. 選擇目的的可能性；（die Möglichkeiten）
 2. 拘束所欲目的之實現的必然性；（die Notwendigkeiten）無論屬於自然的或精神的；
 3. 撰擇目的及欲實現這目的之手段的多分性；（die Wahrscheinlichkeiten）
- 欲確定這些，我們必需努力推敲事實之精細概念。

我們要能夠判斷各派，必須有鞏固的基礎，這基礎不外是現狀的及支配現狀勢力的詳細智識。於此尤須認識現狀之根本的特徵及指出其大體。在這點上科學家又與實際的人們不同

了。後者知道事變的細節較多而卻常常失去整個連關的觀察。我們最大的使命正是求這個觀察的深刻化及尖銳化。所以我們不當迷失於每日發生的偶然事件中，而必須不管這些，卻努力去感領時代的脈搏（即時代的潮流）。實行家如政治家商人「通訊員」——為數星期數日與數小時而思慮，我們的使命則為幾年幾十年或幾百年「而思慮」啊。

照我的計劃，我起始繪述資本主義現狀之輪廓。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狀況，在各國顯然地各有不同。讓我以歐洲的舊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德國，作敘述的範圍。

在那兒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到現在還算是最普遍的經濟制度，當然這個經濟制度，已經失去了牠從前曾一度所佔有的優勢了。

與牠（資本主義）並存的，還有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制度，其範圍如故，依然保存，甚至於若干國家內反得伸漲，這祇要我們一想到農民階級就好了。與資本主義相並行着——這是最重要的事實——有經濟生活的新方式之發展，與前者角逐爭權。各種合作制度及公共的營業之產生，為數至多，常與資本主義的利益，和合滋生着而成所謂混合公共企業及類似的東西。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本身，卻因之感受巨大的變化了，我們可向那表出經濟制度特點的

三方面去追索：經濟之精神的變化，秩序的變化及技術的變化。

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思想，我們常慣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這精神在過去數十年感受重大變化，足使變更牠的本質。這資本主義的本質，過去基於合理主義與不合理主義，投機與計算，考慮與冒險的緊張。這個緊張現在卻已經減少了；合理的原子，大有增加，同時亦有企業過度合理化的發生。全合理化的精神，卻不再是真正資本主義的精神了！這個變化，我們能細細地追索。我們觀察到企業特有的意義即直覺（Intuition）及靈敏的感覺，已經多麼地減少了；可知或預先可知狀況的數字，有加無已，而企業家的建築其企業於知道制度（System von Wissen）之上的傾向，日有增長。這樣，企業帶了行政的性質，牠的管理者有官吏的性質，而企業機關的巨大，又助長這個趨向。同時逐利心漸漸減少，尤其減少的是虧賠的決心；安全與永久則被希求着。最受打擊的是胆敢性，衝前性，冒險與攫取性，於是一種笨重化蒞臨到大企業家，此係集中化即卡台爾化，股票制度等的一個直接結果。倘使我們要論及在真正資本主義中亦佔重要位置的不合理之權力追求，那末須認知在這國家監督的時期及立憲式工廠的時期中，這不合理的權

力追求之意義，必然地愈趨愈小了。

上面最後的幾句話，已與資本主義的網羅制度之本質變化的第二方面相接觸：秩序適合於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的秩序，是自由的秩序，我們也稱之為個人主義的秩序，如不久以前德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證實地說：「德國民法，適應其發生時代之狀況，站在個人主義觀點上。」這經濟秩序與自由的法律秩序，更同風俗秩序與條約秩序，於其最重要的各點上，在最後人類一代過程中，漸漸地成一束縛的秩序了。以前各處及各方面自由的企業家之被拘束，可以為這個狀態的特徵。這些拘束各有不同的方式：

〔第一〕，單個企業家的自己拘束：由於繁文縟禮化，營業的精神化，這營業不再被自由的獨斷獨行，而為一種條例的「制度」所支配；企業家彼此為卡台爾等所拘束；〔第二〕，被國家所拘束：很久來已被勞工保護及勞工保險，近來則被勞資仲裁制度（Schlichtungswesen）及物價控制（卡台爾條例），最近竟被直接監督（行之於大銀行）所拘束。〔註一〕〔第三〕，被勞工所拘束：營業委員會，工會的插入意見，工資條約及其他。

最後——這也許是最重要的——經濟生活之過程與經過，經濟的技術亦根本地變更了。這裏所變化的，可以用一句話來總括地說：許多規定好的干涉，來代替經濟事象的自然流動，「動」的制度變為「硬」的了。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所建基的舊有的市場機械，是被取消了。這市場機械，大家所知道的，基因於自動的作用：供給與需要決定「市場狀況」，市場狀況決定物價，物價決定工資，工資決定利潤。現在沒有一件再存在了。物價現在卻由卡台爾獨斷地規定（或竟由於國家）（註二），工資不顧市場狀況，被工會專制地規定，所以我們在最後幾年內經歷到以下的事實：物價與實際工資（*Reallohn*）與舊時相同，而市場狀況則陷於空前內低落。這個於各方面清楚地感覺到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擴張方面與強度方面（*Erweiterung wie in intensiver Hinsicht*）所受的變化，使我認為經濟生活產生一新階段，照我的經濟階段的系統，即每一經濟制度的後一階段之特徵為該制度不得不讓新興的經濟制度分其統制權，因之而發生該制度結構的變化，此變化由於攘奪統制權的經濟制度之精神內所發出，這產生的新階段我名之為後資本主義階段。我們現在所處的後資本主義階段，我以為牠——倘使

我們可定確實時期的話——起自歐戰。尙有一別的理由，使我作該時期（後資本主義）的確定。明明白白地，經濟的制度，在我們的時期，不僅被各個國民經濟內部的各樣不同的經濟制度之外表効力及內部結構所支配，抑且被牠（各樣不同的經濟制度）與外國的國民經濟之關係所決定。這後者的關係，自歐戰以來，同樣有根本上的變化，其變化與經濟內部的變化，同一方向地前進着。

爲容易明瞭大體起見，我將於連關處敘述這些變化（見本書第三章），現在僅限於敘述各國國民經濟內部的改造，這是爲國民經濟的將來問題所必須研究的。

第二章

我們觀察了歐洲舊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狀況以後，就先在這些國家內，問問資本主義的將來。據我所見，約有三種形成的可能性，正適合三種立場：保守的，反動的及改良革命的立場。

第一個可能性是一切照舊，原則上，要保持現狀。這就是說：我們跟着一條緊急命令再一條緊急命令地無整個計劃地前進；這邊補縫些，那邊修理些；我們「靜待」罷；我們這邊給些補助金或訂一件貨，那邊受我們的監督；我們保護農民卻又促進出口工業；簡括而又懈怠地說：「我們慢慢地下去罷。」

由這保守的立場出發，而願望事態如此形成的，除執政者以外，實在——最少在德國——沒有其他的人。各政黨都不滿於現狀：這個怨束縛得太擴大了，那個怨資本主義尙有多大的剩

餘，但大家怨規定好的干涉之無計劃，及偶然與專制。這統制的狀態，正是因為這一般的缺憾與疑問，而統制狀態有希望維持為將來的經濟方式？這個疑問待將來再證實罷！

第二個可能性是開倒車：我們回到所謂自由經濟的完善狀態，回到一個真真的，不假造的，帶有無限制的企業家之獨斷獨行與具有統制的資本主義。

有力的一部份人們努力於這樣的開倒車：企業家的大部站在這反動的立場。雖然如此，我們不相信向後回到「自由」經濟能夠實行。我們必須顧慮到以下事實：廣義的自由商業，即無阻礙的個人經濟，在前百年或更前輸入，基因於十八世紀所傳之誤解。當時牛頓天星行動之學說，即天星因驅吸而永遠維持平衡及和諧地循行其軌道，支配當代精神。人們把牛氏之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以此思想聯結着神像預定之和諧的玄學想像，以為人類之社會，正如滿佈星光之天，有一被上帝所定之秩序，只要無阻礙地守此秩序，個人的與整個的最高幸福與舒適，自會達到。照這強有力而背後站着奮勇贊護資本主義制度者的黨派之意見，這「自由秩序」基於單個主體之自由動作，正像天體（Himmelskörper）因驅吸而生「地域的和諧」，經濟主體

也因熙熙攘攘而造成在地上之「利益的和諧。」

這麼一個思想，最少是一個奇特的思想，以前沒有一個時期墮入其中，現在——雖然是一時期的而局部分的——竟會實現，則必已實現其一定的，歷史上所規定的前提了。這個讓經濟單位作其所願做的事而以爲一切必返趨於最美滿點的思想，實在太奇特而兼冒險了。必須所滿足的前提而已在十九世紀初在某種程度已滿足的，以能使「自由」經濟思想之實現，不外以下幾個：

（1）「自由商業」曾用作一種有力的急於發展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武器，以與其敵對的行會式秩序的手工制度及政府廣大的監督政策二種勢力相周旋；這是資本主義的利益，牠威張爲一般利益而在某種範圍內，竟可代表一般利益；

（2）在國外與國內，以前尙存着自由的操作區域，生產力之發展，達空前絕後的速度；

（3）與工業及經濟二方面之「進步」相比較，則經濟單位（指單個企業，如銀行工廠等）尙小而速度適中地行動着。

假如我可以用一比喻來解明，這使「自由商業」能實現的條件，那末可說：「自由商業」對整個經濟的意義，差不多如同對車馬交通取消行路規則。倘使祇有慢慢的馬車馳行着，規則的取消——也，只在限制範圍內——並非不可能的，或竟可行之於都市；如其是一片廣大的平原呢，或可讓疾馳的摩托車汽車行駛；可是在人口密集的都城中，讓疾馳的汽車無規則地通駛，那無異是癡狂的了。

在將來將回復到一個無規則的經濟——不管人們對牠的功過之判斷如何——我覺得很少希望，倘使我們將以下的事實，考慮一下：

(1) 自由的企業行為之功能的大部，因資本主義的本身發展而消亡了；單個企業家的自由之功效，在大銀行，卡台爾，康采爾 (Konzern) 等大組織下閉塞了。這些「自己拘束」(股票制度屬之) 的解放，成了現代許多流行烏托邦之一；

(2) 太有力量的利益團體，不贊同國家拘束經濟生活之廢除，我在上面約略地說述了；我們只要一想到工會就夠了；

(3) 就是爲全體利益計，「自由」經濟之再輸入，與之亦有抵觸。我們必須想着各方面已實行的經濟單位之巨大擴張，已造成了新的條件。因這些條件，私人的經濟領導，變成一個一般的（公共的）事件了。我們剛才已經看到我們銀行的命運了。（註三）當銀行小的時候，我們可以安靜地看牠破產，但是一個新式銀行之崩潰，牽引大眾，無論國家願意與否，不得不挺而維持。同樣是工業的企業。一個小小的鐵礦，那末可任意作爲。一個鋼托拉斯就不能了。牠的態度牽及千萬人的利益，所以牠的命運，整個社會也不能不管。沒有一個國家能忍受有主權的「工業公國」建立於其國內的。

既然保持與復古二個可能性都行不通，那末我們必須問問餘下還有什麼呢。那末明白地祇能造成經濟生活的新方式，這就是站在改良者或革命者的立場之人們的要求。

將來成爲經濟生活之那一種方式問題，我們如欲解答，必先再來觀察這經濟生活的整個精神。我們若欲清晰地確定未來的經濟生活之整個精神，必先把牠與現在及過去的整個精神相對立。現在的特徵是無計劃的束縛與無計劃的制定規則，過去是無計劃的自由與個人專制，

將來的特徵，祇能是有計劃的經濟形成。當我說這話的時候，就是——為說出這話的整個及內質——預料

計·劃·經·濟·

作為將來的根本思想，我深知道喚起讀者最不同的各種想像，而許多讀者必感觸到深刻的，或許由於意志或知道所演繹出來的矛盾。可是我相信，倘使我們將計劃經濟的概念得有清楚的想像後，大部分的矛盾，可化之於無形了。緒言時我說科學家重要任務之一，在於深刻理解現象的概念，說明白些，在於分析那些口頭禪。計劃經濟是最不定而常變換意義內容的口頭禪之一，所以我在底下稍作詮釋。

計劃經濟——不必，也非無條件的，與自由的個人經濟，可是——與粗野的，紛亂的，無秩序的，無計劃與無意義的經濟相敵對，當然要站在一大羣作經濟行為的人們之整個經濟立場去觀察（這一大羣人們的整個經濟雖是紛亂的無計劃的），在牠裏面卻存有秩序的許多個人經濟存在。（資本主義時期，正以個人經濟之特別有計劃及整個經濟之無計劃所生之矛盾為

特徵。也許我們說有秩序的，有樣子的，有教養的，有意義的經濟，比較對一些，這種經濟，或竟稱之爲組織的經濟，惟須記着我們僅欲以此比喻地說明這個事態，真要說的是：這是意義之連關的造成，這「好像」是一個有機體罷了。無論計劃經濟或自由經濟，我們均着眼於「整個」在這整個中的各部分之間，必有意義樣式的關係存在。實際上每一個國民經濟，即使是「被整理」好的，也非有機體。我們不去用譬語，卻純粹概念地理解事實，比較好一些。

對我們所稱爲計劃經濟的，稍加一些普通的說明，說明他的本質，即提出與其概念必然地緊連着的特徵，蓋非如此，不能得一確定的清晰的意義。據我所知，這種特徵不外有三：包含一切，統一與五花八門。我對此所擬揣的，寫在下面。

一個真真的計劃經濟必須有

1. 包含一切的特徵。或者我們也可說：總體的特徵（決不是部分的，如傳佈這講演的某訪員所誤傳）。這要說：設計要及於某一較大範圍內之經濟的及經濟事變的整個，這才是計劃經濟。這整個必須以意義爲依歸而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團結。普通視爲一意義的組織，經濟學上，我

們分一切部分爲：生產，流動，分配與消費。設計必伸張及於全部，尤其伸及到消費。一部分的設計，是含着內部的矛盾，正與一部分的合理化相同。祇有經濟生活的各部分之變化，使成爲一有意義的關係，然後我們有資格說一個整理的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從組織上說來，一個國民經濟，倘沒有最高的設計委員會是不行的。

不過我們不常對這樣的總設計有過分的奢望而妄想我們所喝的每一匙羹，也必須有計劃的分配。設計不是監督，不是管理，在各方面均無束縛的。放任也能屬於設計之內的。所以在每一總設計中，有足夠的不規定的範圍，因之有餘地的存在，如於消費範圍內，每人可爲所欲爲的。我以後在敘述經濟方式時再說。

完全的計劃經濟所呈的第二個特徵是

2. 統一：這是說：設計必須從一處出發，這個特徵必須與計劃經濟概念不相分離，是牠的根本特點之一，因爲多數的設計處，又將有內部的矛盾了。可是這設計所出的地點，照目前狀況看來，決不能是國際的組織，像國際聯盟之類的一種形式。卻在最近的將來——即使非永久的——

——只可由國家表現出來之民族的單位，作爲這種中心機關。所以計劃經濟必爲國家經濟。現代
二大思潮即可總匯於此，必須熔合一爐。正如計劃經濟必須國家經濟，國家經濟必然地是計劃
經濟。

我於此不得不闕除這與此計劃經濟概念容易牽連的錯誤想像：好像個人的自由決定，無
論生產者的或消費者的，被經濟生活之規定所取消了，而以前則全部地存在着。其實不然。限制
我們的自由決斷的機關可以變更，而自由決斷的本身，祇有局部分受範圍之限制。

即使以現在而論，生產者與消費者並不十分自由啊。前者一方被「市場」的需要，他方被
競爭所決定。後者呢，倘倘未被國家或風俗規定地干涉，那末於我們這個時代差不多完全被發
明者與工業家所操縱。因爲製造出來的，只是在市場上可得盈利的商品。至於消費者要不要牠
們，他們是不管的。消費者偶有的抵抗，即被各種富有意義的方法所屈服。倘使我是馬車或煤爐
或無聲影片的嗜好者，那末其他一切對我有什麼用呢？我不得已祇好「消費」汽車或汽爐或
有聲影片，除此以外，祇好消極抵制。但是消極抵制，我們可能施之於任何一種經濟法制的。

我特別注意於指出計劃經濟第三個根本特徵之

3. 五·花·八·門，不但與前二者包含一切及統一相融洽（表面地看來，好像不然），且亦爲此經濟法制之一大特徵，所以必然地與牠的概念相連結的，這是說：計劃經濟沒有這個五·花·八·門的特徵，是不可想像的。夫經濟只能於顧慮牠的條件之千百樣式中，才能得到有意義的形成，如其反對這種理解，那爲盲目的空論事實主義了。

經濟生活形成的五·花·八·門，必須及於各方面。最先及於設計的目的及方向，以適合欲建設經濟的國家單位條件之不同。如僅欲立一適合各國民經濟的統一計劃，那是荒謬極頂了。這裏所須注意的及必須決定計劃的是：

（a）經濟區域之絕對與相對的大小。一個極小國家如瑞士的或比利時的國民經濟，怎麼可以受得了大如俄國或中國的同一設計！欲求一同樣的經濟形成，適合於人口稀少及人口衆密的國家：適合於一方基羅面積有二百六十四人的英國或一百三十四人的德國，與十五人的俄國，九人的芬蘭，四人的阿根廷或巴西；這是何等的愚癡呢！

(b) 計劃經濟必須依據一國不同的社會結構，而根本不同。我們怎樣可以待遇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農民的保加利亞，俄國，土耳其，有如呈百分之八農民的英國，百分之三十的德國呢！在這幾個狀態中，經濟有意義的形成之綱要，卻是相反：那邊工業化，這邊（再）農業化，即在同一類的國家：在有真農民的德國與一個幾乎沒有農民等級的英國，必有多大的異況！還有多大的不同之處，存於這手工業尚佔有相當地位的德國與絕無歐洲式手工業的俄國或美國之間，或與已失去手工業地位的英國呢？

(c) 民族性格，文化程度，及一國之整部歷史，必須顧慮到。一新興與一疲乏的民族，一積極與一消極的民族，一極文明與一半文明的民族，每一處都需要計劃經濟之個別形成。我們不消詳述俄國與歐洲，中國與日本，印度與英國，巴西與瑞士，德國與法國之間，存着何等的異點哩。一個完美的計劃經濟更須於選擇經濟方式，經濟法制，經濟制度時，須求其複雜，這種認識是特別重要的。沒有比以計劃經濟為經濟方式之一元論及以之與公共的經濟，共同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或集團主義等相並列更錯誤。烏托邦者的改良計劃，均失敗於解決這一元論上，因為

他們是盲於真實的空論家。最後蘇維埃主義，倘使他們領袖不去想一較好的辦法，亦不免失敗。

以五花八門為條件的經濟生活，需要着形成的各種方式，而一國或一時代之經濟生活愈複雜，則其機關亦必愈多，這是事實的自然法則。作為經濟循依軌道的經濟制度之數目，於數百年過程中常常增加，這不是偶然的。歐洲經濟生活之初，僅有農民的自營經濟，以後增加了賦役農場經濟（*Fronhofwirtschaft*），而前者並不因之消滅；以後再加入手工業經濟於前二者，以後再加入資本主義，而農村經濟，大地主經濟，手工業經濟，並不消滅，最後其他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相並着，一一出現，而資本主義與以前的一切制度，繼續存在。新經濟制度之加入舊經濟制度，我會比擬「走法」（*Fuße*）（註四）音調，常有新因發現而舊因並不因此而停止發生。

這裏我們明明白白地有一種法則，經濟生活之形成，屈服於其下，即盲衝的資本主義亦必貼服，因為即在資本主義權威之下——反馬克思之預言——決非祇有那資本主義龐大企業的一種形式造成出來，各國卻多少呈現着一羣花花綠綠不同的經濟制度與經濟形式。那末，倘使資本主義本身亦不能破壞這些形式的複雜：一個計劃經濟怎樣可以拿這個失望問題為己

任呢！而況一個計劃經濟，還要經濟生活的有意義的形成啊。經濟方式之適合於經濟目的或適合於每一經濟區域之特殊要求，亦屬於經濟生活有意義形成之內，且此為最要者。這些經濟區域，很明顯地，是根本不同：農業與工業，商業與交通，在大體已需要不同的形式而在小節方面則更甚：對外貿易與內地貿易，批發與零買，大城貿易與小城貿易，每件對組織均有根本不同的要求：怎能使一個經濟制度滿足這些呢？

所以每個美滿的計劃經濟，如要滿足其形成的有意義經濟的任務，必需顧慮着這一羣花綠綠的經濟方式與經濟制度之並存與相互交錯的情形。私人的個人經濟與市場經濟和集團的需要滿足經濟（Bedarfsdeckungswirtschaft）（我這個名詞遭有被成誤用的口頭禪之命運）將存在着那兒；農民經濟與手工業經濟將存在着那兒，合作社經濟及國家經濟或共同經濟將存在着那兒。而且——這裏我們特別關心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及其領導者之廣大的負責心決不任其缺如，這是因為還有許許多多經濟生活的問題，最好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倘有人因學說的頑固而只要放棄這些繁複的形成方式之一種，那是狂愚而且十二分

的狂愚！即使所謂競爭，最少是效能的競爭，不必擯棄，而必需在整個計劃中有意義地插入才好。我所要說的，可以賽馬的比喻來說明。賽馬是一個富有藝術意義的組織，需一完善考慮的計劃，然後能表現出來。與賽馬場主的談判，與騎馬者的條約，跑線的佈置，觀客之組織，正如跑馬條件之詳細規定，跑路之標識，出發之實行，目的之規定等等，同屬於此完美考慮好的計劃中。可是賽馬本來的意義，則在於給予一羣馬匹在「競爭戰鬥」中試測馬匹能力之一種機會。

倘使我們用這樣方法來真真明瞭計劃經濟，那末這個為選擇：私有財產或集團財產及與其有密切關係的私有經濟或集團經濟而爭執不決的大戰，在計劃經濟範圍內，消滅於無形了。理智地去講，問題並不在選擇這個或那個而在二個都要：私有財產與社會財產，私人經濟與社會經濟將能並行存在着，而且必須並行存在着。

最後一個美滿的計劃經濟，在勵行手段上，必呈現無窮的複雜。其手段不勝計。惟其中最要者，則為道德的或教育的手段，尤其在消費計劃時需用之。屬此者，則為個人根據理知之熟思，對社會整個取有利的生活態度之決斷。教育羣衆，使成一有意義的生活，同時還造成一個能促

成這樣生活的環境，亦屬之。養成人民之善良性情（如花園之操作等），至爲緊要。如法西斯蒂之 *Doppo-lavoro* 工作所含有之手段，已有成效。團體，組合，同志會，會社，友朋會等之助促，亦將不可缺如。教育所贏得之成績，然後則以傳統及風俗來保持及鞏固之。

可是絕對沒有公共權力——國力權力——之干涉，還是不行的。這些干涉，以有意識地規定經濟現象爲目的。其數甚衆。我們可分爲直接與間接的規定。

屬直接規定之最要手段如下：全經濟部門之收爲國有或市有，係最澈底而於困難狀況中不可免的手段。不甚嚴厲之手段，則如某項經濟行爲之被國家獨占，監督及特許。最緩和的規定方式則由國家津貼此個或彼個生產部門，此個或彼個交通企業，此個或彼個商品分配營業。此外如公共團體之援助某一營業，變更其行爲成一有意義的，或予以有計劃之訂貨，亦屬此緩和之管理方式。他方則有害公衆的企業之禁止，必不可缺。

教育單個經濟主體，譬如於冬季學校教育農人，亦能於生產方針及生產方法上，實施吾人所欲的影響。以德國而論，則大規模之移民方針，至爲重要。

如公共團體之權力，施其作用於經濟組織之適當機關上，則為國家對經濟現象之間接的規定。我這裏想着許多如監督等的事件，普魯士農業銀行已富有成績地監督其支配下之農村營業了。尤其想着組織方面的問題，係銀行於將來負責實行的。大銀行的公共性質被人認識而承認後，牠們似有職責，運用計劃經濟的有意義的信用政策，成為國民經濟之規制的機關了。

除外，國家尚有許多其他手段，來間接的有計劃地干涉國民經濟。國家既可運用一聰慧的而免去純粹國庫性質之租稅政策，又可用一有目的意識的商業政策，亦可用理解的貨幣政策，以施行其對於國民經濟形成之深遠的影響。

我們敘述了實行計劃經濟的各種方法大概之後，使吾人認識，就是將來所取的方法，大部分現在已知道了。每一理性的計劃經濟，須選取現在已經知道的及有效的方法，這樣，才能保證現狀慢慢地向有意義的經濟，「組織地」引渡過去。事實上，我們今日已經應用各種方法，將亦為將來所應用的。將來與現在之分別，僅為一點——這就是整個計劃。沒有牠，亦沒有計劃經濟，就是也沒有如我們所願的有意義的經濟。我們雖然尊重計劃經濟之目的，方式與手段的複雜，然

而沒有全盤與統一，經濟仍爲一堆的分亂物件，仍爲混沌。只有這「計劃經濟」的如我所指示的三種要素有保證後，才能將國民經濟形成一個秩序的世界。

第三章

將來經濟生活之形成，尤其資本主義之將來，大部被各民族間的經濟關係所支配。這讓我在下邊敘述。我們又要將幾個口頭禪來分析，因為以後拿牠們來討論的。

我們在今日經濟科學盛行之時而以爲世界經濟的概念，尙未完全解明，則將予此科學以不良之判斷。因爲倘使我們談到世界經濟，我們決不以全地球民族彼此處於較密或較疏之交通上之指示爲滿足。因爲這並沒有說出什麼來。問題是交通的樣式。在這裏我們必須以歷史的頭腦來確定這國際間交通的形式，於各時期中絕對不同。「世界經濟的」關係，各時期都有的。五千年以前發現於五洲的文化世界，三四千年前在近東區域內，二千年前在羅馬帝國，一千年至五百年前在「中古」二三百年前在重商主義時代或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即與我們有關的現在：資本主義高期及晚期時代，也有國際間的交通，而人們卻特別鄭重地認現在爲一個世界

經濟的時期，以有別於過去，實係錯誤。但是「世界經濟」在各時期中有牠特別的樣子，對人類經濟之意義，亦各不同。而在資本主義高期過去時，世界經濟尤呈特色之形成。

倘使我們要將資本主義高期的世界經濟之特有的形體，用一句話來標明，那末我們說一句大膽的話，認為白種之統制世界，倘要情感地說這同樣的事實，認為西歐之剝削世界。這世界經濟的極奇特的形式，有三種前提：

前提中之第一個，其性質較偏於形式方面。牠建基於滿佈全世界的運用自如的交換，調劑及適應機關，這機關建築於「和平，自由貿易及信用」之上；和平，自由貿易及信用，表現於金本位的匯兌行市制度之中及因此而生的各資本主義國間的外匯交通之內。這機關大半由倫敦市管理其行動。

這資本主義高期的世界經濟之第二前提，為非歐洲經濟之「建設」，均得歐洲資本之助力而能實行，資本流入這些被視為歐洲資本主義對象的國家，或直接的，或經由公債之路。我們記得德國於戰前有二十至二十五兆馬克，英國法國則有此數之四五倍「投資」於外國。

那個世界經濟的第三條件是一定質料的商品交換。西歐把全世界的土產，無論爲食料或原料，引爲己有而償付之；或以以上所言之資本或以工業品償付，或——竟不償付。

由這種關係，漸漸生出非常奇特的世界人們及其經濟之聚集：西歐如一生長成之四萬萬人口的大都市，其他的世界如鄉村圍着這都市，正如中古時代，鄉村圍着每一都市，甚至於小城市一樣，以土地之出產品供給城市，他方則仰給於城市之工業品。

現在我們來確定世界經濟的最後形式。所建基的三個前提已經在現在，一定也在將來，不再適合了。

在我們眼前所演變的，第一是張佈着世界經濟的自由機關，早已崩潰了：沒有和平，沒有自由商業，沒有信用了；這是時代的標記。現在則有關稅壁壘及輸入禁止，信用的收回，到處是不信任。金本位的失效，僅是進入我們眼裏的一個舊存關係解體的特徵，金本位因世界全部金數幾集中於二處而引入非理知的路上了。

也許有人對這種現象，並不覺到有什麼重大意義，因爲他們以爲這是暫時的擾亂而相信

國際間的等量，將再恢復其舊有的平衡。事實上，如欲恢復舊有的平衡，必再履行舊有的世界經濟之條件及物質上之條件。可是這正沒有多大希望啊！

西歐再能作全世界的借主，我以為想像不到了。因為資本籌集的需要，與外國發展其國民經濟，即工業化的程度，同樣增加，而歐洲各國之資本堆積數量，卻反有減少。

最後這句話的確實，我們最好應用馬克思的有名方式，絕對與相對的剩餘價值方式，來證明。這絕對與相對的剩餘價值二者，將來不會近似過去的那樣增加。絕對的剩餘價值所以不會如以前那樣增加，第一因為人口增加速度，不如以前了；法國好久以前就停頓着，英國近來也停頓着，德國則將要停頓（近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來，生殖率由千分之三十五減低至千分之十七又半）。第二，因為勞工時間決不會擴大而反有繼續縮小的趨勢。第三，因為經濟速度恐怕要緩和了。相對的剩餘價值之所以不能增加，因為絕對的工資，就是勞力的價格固然增高，可是工作的生產率不，則無論如何，工作生產率不會與牠最近百年內增加程度成近似的比例啊。

除外再加上外國的名譽心，要自己資助自己而這個漸漸也竟可能了。這樣，他們不要仰給

我們的資本，他們於必要時，應用些吾們的才智罷了。

聯帶着這個發展，舊世界經濟的第三個條件消滅了：西歐與世界其他各處的特有的商業交換沒有了。這特有的商品交換之所以不能再維持，就是因為上面所述農業民族的工業化之前進。這些民族減少吸收工業品，西歐工業品之輸出，因之而縮緊了。

有人常說，這些新國家的資本主義之建設，予舊資本主義國以輸出之促進。我相信，這是錯誤了。這些新興資本主義國將大半用其己力來建設牠們的生產手段機械及必須慢慢地——也許過了一個短的過渡時期——放棄輸入，所以致此之理由，甚為簡單，因為他們沒有對等價值來償付輸入的工業品了；他們所以沒有對等價值，因為他們不能同時建設本身工業及輸出原料與食料於歐洲，或者換一句話說：照農業基礎與工業上層間的相稱比例原則，普遍的說，照有機的生產與機械無機的生產間相稱比例原則，在同一農業基礎上，不能建設二個工業制度，本身的與歐洲的工業制度。這些國家也不能擴大他們農業基礎，因為他們，否則將更積極（intensiver）生產農產品，而其價格亦必因之更昂貴了。

而且農業國家百年來所以能以這樣價廉的生產品供給我們，因為他們無顧慮地濫掘以及耕種人民之自己受餓。這二者將來不可再希望的了。非歐洲民族，無論在那面看來，已經由西歐的監督制度及剝削制度中拯救出來了。「有色人種之解放」現在正在大大地進行：以世界歷史上觀察，這是大戰最要的結果。「白種的統制」世界現在已經過去了，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及其他戰前的事實，亦遭同樣的命運。

倘使將來「帝國主義的」趨勢，尚可維持的話，那末在現在統制國家中，恐是美國、日本或者俄國了。

倘使這發展的路線看準的話；舊資本主義國的國民經濟應當怎樣呢？明明白白地，只有作斷念的強迫，而效以前倚賴於他的國民經濟所爲的：把自己退回自己來。我們常以一外國字來說明這個自束而名之曰

自·足·化·

這樣，我們又碰到一個口頭禪了。牠於近來思想爭鬥中佔有地位，而其解釋之複雜，並不亞於我

們上面所談的那個「計劃經濟」讓我來試解剖這個字的意義。

自足不必一定解釋爲一國民經濟完全獨立，或如普通日報的語氣，一百分獨立，即拋脫一切國際的關係。這樣的目的，祇有頑固的學說者能制定，這目的的達到，想來一輩子不會的。我們也應當自己問一問：究竟爲什麼（要達到牠）呢？

自足更不解釋爲各個的，甚至於最小的國民經濟的獨立化。吾們在追求自足化中，如計劃經濟一樣，反要顧慮每一國家的特狀。小國民經濟共同連結成經濟聯合而造成一足夠大的基礎，以建造一多少自足的國民經濟，這是無疑義的。具有相同的經濟條件的國家，將彼此聯絡。至於怎樣一件件進行，這裏我不能詳細敘述。我覺得德國與歐洲東南國家較緊密的連結，是對我國（德國）一正確的解決。

爲要免去這個「近似」的或「比較」的自足不要太游移，我要說明我所認爲的文明民族有意義的自足制度。我覺得這自足被對外關係質的規定較量的規定爲多。我們所追求的，是由一國家中心點出發，還要達國家間的經濟現象之有目的意識的與有計劃的形成。我們必

須避免陷入使我們後來受痛苦的狀態之中。我們必須以命運的自決，甚至也在世界市場上自決我們的命運。爲我們的目的。可是這個目的，決不能在機遇的路上，即在自由貿易的路上，所可達到的。假如我們要促成民族彼此交通之富有意義的秩序狀態，則必需剷除自由商業制度的最後殘餘，直至無餘爲止，這不祥的、最惠國條約，我以為亦屬此殘餘內的。

不是自由貿易與最惠國條約而是商業條約，關稅同盟，優待稅則，利益分配等將爲將來國際間關係所可想像的範疇。因此，與其說自足（Autarkie），不如說國家的自給（Autarchie）。但是經濟有意義的形成之前提，還是一個整個的、統一的計劃。

一個民族團體如不直接倚賴於牠及他民族所發生之關係，就是牠爲生存計，不必需要對外之貿易而僅以自由的斟酌輸出或輸入其所嗜之物，我們已可稱牠爲實際上的自足。一百年以前的西歐各國民經濟，均處於這樣有意義的自足狀態中。當時德國（普魯士）的商業決算的狀況如下：德國輸出土地之生產品，或爲原料或爲製造品，原料如米穀，豆類，種子類，及磨臼出品共佔全輸出百分之二〇·四四，羊毛原料則百分之一一·五九；至於製造品，則毛織品佔全

輸出百分之一七·七一，亞麻布百分之二一·二三。這些貨物，幾佔全出口價值之四分之三，係出於本國土地，而加以適當之人工，其生產量且超過本國之需求。以此輸出所得之價值，向外國購買心胃所欲的，增加人生樂趣的糖，咖啡，熱帶菓子，絲，烟草，醫藥品等。

所以當時的出發點是輸出，然後跟着輸入。這些具有如此的商業決算之國家，我因之稱爲輸出國家。牠們所以爲自足，因爲牠們於必需時可放棄輸入，而並不妨礙其生存。

這個事態，於十九世紀過程中，根本變換了。我們竟必須大量輸入貨物，或爲人們的食料或牲畜的飼料，或爲造成工業品之原料，以維持我們的生活程度。我們現在（一九三〇年）最緊要的輸入品如下：

榨油之果實及種子（百分之六·二〇），棉花（百分之五·六〇），羊毛（百分之四·四〇），牛油（一）（百分之三·六〇），木料（百分之二·九〇），鐵礦（百分之二·六〇），銅（百分之二·四〇），麥（百分之二·二〇；一九一〇年百分之四·二〇），雞蛋（百分之二·二〇），大麥（百分之二·〇〇），水菓（百分之一·九〇），脂肪（百分之一·九〇），肉（百

分之一·三〇)魚(百分之一·三〇)等等。

這些輸入品，戰前我們一部分以外國投資的獲利，一部分以工業品償付，而今日則幾全以後者償付。輸入與輸出之關係則相反了：輸入變成初步，我們必須先輸入，然後可輸出。照我的詞句用法，我們由輸出國變成輸入國了。因此我們失去獨立性，我們不再自足，即最低限度的自足，亦不可得了。

我們再能像以前一百年那樣的自足麼？很難的了。要從前這樣，我們的人數太多了。因為住在同此面積的人數，在此一百年中，多於兩倍。即使我們要把生活程度大大降低，我們也不能再一方以我們土地的生產品過活，他方以大量土地生產物品供之外國。我們將於某種範圍內常常利用外國土地，而必須以我們的勞力，去償付向外國土地所得之生產品。但是問題在程度的如何。我們最少限度決能達到生產本國所需要的人們糧食。我們不必需要向外國購買(一九二九年)二六萬萬一千八百萬馬克的食料，其中牛油，乾酪，雞蛋已佔八萬萬四千四百萬了。引向國家自立之目的的路，明明白白地指示着：是再農業化之路，牠好像於我們國民經濟的內部

建設中，佔有極重要地位之天職。

讓我們來說說數字：我們必須努力，將現在佔全數百分之三十的農業人民，最少恢復到一八八二年調查所得的數字，即百分之四二·五。我們農業人民所要增加的百分之一二·五，差不多等於我們以後數年內的失業人數。

結論

這是將來經濟一般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之可能性，必然性與多分性，這正是我要貢獻於諸先生的。

至於能够實現多少，那末像我起頭就說的，全靠人們的自由之決斷：即全靠人們的意志。這意志的形成，受經濟的或其他任何的考慮爲少，大部分完全是受決斷其命運的人們之不可捉摸的世界觀所支配。人民對整個經濟的意義如何，視牠重要與否，就是說：人們安置經濟於那一種意義連關內，均視人們的世界觀如何而定。根基這個意義連關而再決定經濟原則上取那一種形成，假如決定要計劃經濟了，那末牠應取那一種方針與形式。

決斷要一個經濟生活的新秩序之意志，其掌持者可有不同：牠可爲個人意志，如列寧，凱末爾將軍，墨沙利尼等例子，牠亦可爲集團的意志。（至於那一個意志的問題）那要全看歷史的

偶然或各民族的特性而定。但是這個意志必須堅強統一有目的意識，還要看清楚。因此牠不能完全缺少科學的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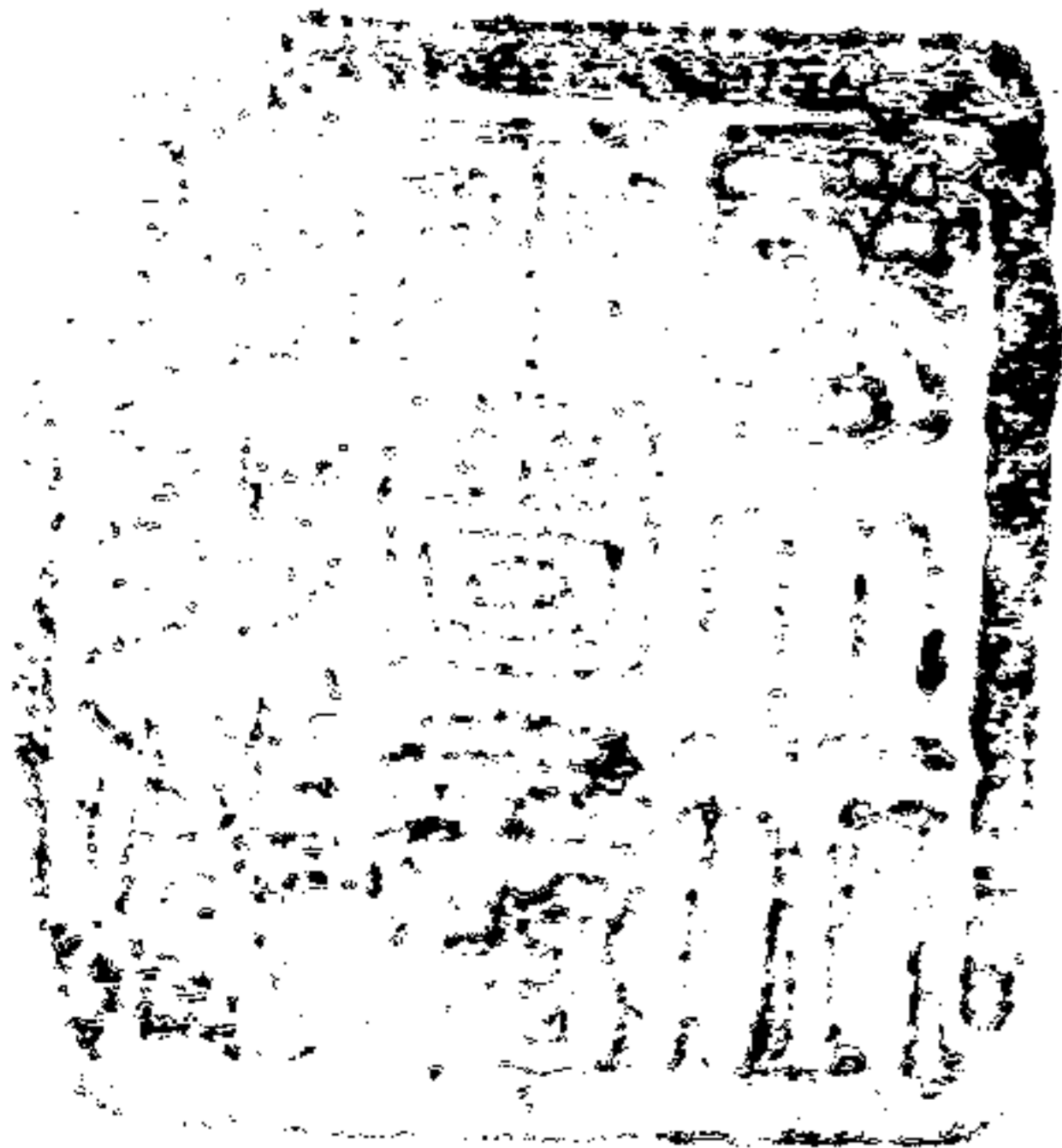
像這樣的一個意志之惠臨我們祖國，是我們大家的願望。因為我們深知，沒有牠我們將淪陷於紊亂啊。

(註一) 一九三二年夏，德國五大銀行之一的 Darmstädter und National Bank (縮寫為 Danat-Bank) 因擴兌而休假，後由國家出而維持，直施其監督權於該銀行。

(註二) 德國於一九三一年，因物價太高，小民無力購買，致經濟不能興旺，而失業亦不得減少。故一面以國家權力減低工資，他方減低物價。厥後竟置一「物價委員」(Preiskommissar) 審查及監督物價。

(註三) 見註一。

(註四) 係音樂調子之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二〇八六號)

社會科學
小叢書
資本主義的將來一冊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Werner Sombart

譯述者
張樑 任

主編者
何炳松 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杜其達)

